

史學作為政治思想 ——古憲法、東方專制、與《古印度史論》

陳禹仲 *

本文探討十八世紀歐洲所謂的「啟蒙史學」及其政治意涵。藉由蘇格蘭啟蒙運動著名史家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的著作《古印度史論》(*Historical Disquisition of Ancient India*, 1791)為切入點，本文分析《古印度史論》的論述脈絡，以理解啟蒙時期的文人如何藉由歷史書寫作為一種政治思辨的媒介，使史學在十八世紀歐洲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論述。本文指出，《古印度史論》與十八世紀末英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黑斯廷大審(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共享相同的論述脈絡。兩者同時援用十七世紀的古憲法論爭，與十八世紀東方專制政治的論述，來分析印度的政治文化，並針砭十八世紀英國對待印度的態度是否合宜。本文繼而指出，這兩種蘊含政治論述的歷史書寫，表現出法國史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之於十八世紀英國歷史書寫與思想文化的影響。以此為基礎，本文論證，這種以歷史書寫作為政治論述的現象，體現了啟蒙史學的特質，也表現出史家約翰·波考克(J. G. A. Pocock)所強調的「史學作為政治思想」的論旨。

關鍵詞：威廉·羅伯遜、孟德斯鳩、古憲法、東方專制、啟蒙史學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史學史的議題在歐美史學界對歐洲啟蒙運動的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視。其重點有二，第一是啟蒙文人如何將「歷史」(History)視為一種思辨的方法，第二則是書寫歷史的「史學」(Historiography)如何為這種思辨方法，提供充分的知識基礎作為反思的視野。¹事實上，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歐洲文人，藉由寫作與閱讀歷史著作來參與當時時事討論(如對人類文明進程、社會秩序發展、與國家興盛等課題的辯論等等)，是自彼得·蓋伊(Peter Gay, 1923-2015)的《啟蒙運動：一種詮釋》(*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一書出版後，便備受學者接受的觀點。晚近的研究成果則在這樣的基礎上，分別從兩個層次，深化吾人對「歷史」之於啟蒙思潮的認識。

首先，是從宗教史(religious history)的角度重新省視啟蒙史學書寫。其成果指出，後人所熟悉的著名啟蒙史家，包含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艾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等人的著作，皆應該被放在更宏觀的歷史思潮中重新檢視。這波歷史思潮，即是自宗教改革以來，以聖經批評(biblical criticism)為基礎開展的歐洲學術文化傳統。該思潮檢視聖經記述中的神聖史(sacred history)、宗教機構(尤其教會)發展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與人類政治與法制發展的歷史(civil history)這三種歷史論述的關係，並試圖藉由釐清三者來重新理解歐洲這個基督信仰的世

¹ 英語史學史的研究對這種思辨文化的研究成果豐碩，在此僅舉近期較具代表性的統整性成果，以及延續此傳統，對在廿一世紀身為史家，如何理解歷史並藉由史學進行反思的兩冊著作：Donald Bloxham, *Why History?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與 *History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界(Christendom)內，政治與社會發展為什麼會遇到特定的危機，並反思面臨危機後應當何去何從。²第二，則是從「國際」(the international)與「全球」(the global)的視角，探討啟蒙時期的文人，如何透過「歷史」來理解歐洲以外的社會，並進而構成他們對文明的理解，乃至對歐洲帝國的批判。³綜觀此二者可見，近二十年來啟蒙史學的研究，或可視為學者分別檢視啟蒙文人，如何分別從歐洲內在(基督神學與宗教政治)與外在(非歐洲社會)的「歷史」，思辨甚或批判當時歐洲社會所面臨的，包含政治、

²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當數 Justin Champion, *The Pillars of Priestcraft Shake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Its Enemies 1660-17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nathan Sheehan, *The Enlightenment Bible: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J. G. A. Pocock, "Historiography and Enlightenment: A View of Their Histor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5:1(2008): 83-96;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5: *The First Triump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Sarah Mortimer and John Robertson eds., *Th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Heterodoxy* (Leiden: Brill, 2012); John Robertson, "Sacred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apolitan Responses to the Problem of Sociability after Hobb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1 (2013): 1-29; Anton M. Matytsin and Dan Edelstein eds., *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除此之外，John Robertson 於 2016 年在牛津大學年度卡萊爾講座的系列演講，亦以 *The Sacred and the Social* 為名，勾勒自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末的史學思潮。

³ 代表性著作包含：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ankar Muthu,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Jennifer Pitts, "The Global in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Thought," in Prasenjit Duara et al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4), 184-196; Jennifer Pitts,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宗教、經濟等問題。換言之，「歷史」作為一種知識載體，成了啟蒙文人思辨當時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所面對的問題時，不可或缺的思想與論述資源。史家波考克(J. G. A. Pocock)稱之為「史學作為政治思想」(historiography as political thought)。⁴

「歷史」作為反思政治問題的思想資源，在啟蒙時期的歐洲實是常態。啟蒙哲士習慣寫作的「臆測的歷史」(conjectural history)，即是藉由抽象化的歷史進程來構想人類的理想社會理應具備什麼樣的事態。這不僅見於哲思，大衛·休謨對當時英格蘭政黨政治的批判與反思，與他對英格蘭政治史的研究密不可分。⁵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對市民社會(civic society)的見解，固然是寄託於某種「哲學式歷史」的書寫，但學者亦指出，其「哲學式歷史」更是深受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的羅馬史研究影響。⁶事實上，孟德斯鳩的鉅著《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本身即是以「歷史」作為政治與法學思辨的論述基礎。舉例而言，他對英格蘭憲政與「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概念的討論，即是以英格蘭法制與政治史來表述。⁷而近年開始備受重視的，對孟德斯鳩法政思想重新省思的研究也指出，《論法的精神》過往被忽略的最後章節，即是透過法國法制史的細緻爬梳來論陳，法國的君

⁴ J. G. A. Pocock,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owar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cock,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7-86; J. G. A. Pocock, "Historiography as a Form of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7:1 (2011): 1-6.

⁵ Nicholas Phillipson, *David Hume: The Philosopher as Histori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⁶ Iain McDaniel,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Roman Past and Europe's Fu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⁷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eds., Anne M. Cohl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Book 11.

主政體儘管不若英格蘭有著明確權力分治的憲政結構，但在法國的政體當中，由過往判例積累的古憲法傳統創造了貴族這個在君主與臣民之間的中間階級(intermediates)，進而使法國這樣的君主政體也得以享有政治自由。⁸

本文以十八世紀最暢銷的史家之一，威廉·羅伯遜生前最後出版的著作《古印度史論》(*A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Concerning Ancient India*，以下簡稱《史論》)為切入點，具體指出「史學作為政治思想」這樣的思維如何影響啟蒙文人。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不是一篇只專注分析羅伯遜的《史論》文本的論文，而是藉由梳理《史論》所涉及的不同史學史脈絡，重構十八世紀歐洲如何以歷史書寫作為一種政治論述的現象。與本文旨趣相仿的，是史家波考克藉由爬梳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多重史學史脈絡，重建十七與十八世紀歐洲文人如何藉由史學構築政治思維與視域。⁹當然，筆者學識與筆力均不及波考克，在本文的篇幅內，也謹能討論《史論》所涉及的兩個史學史傳統，並指出這些史學史傳統如何一方面於《史論》中會合，如何又同時使得《史論》與十八世紀末英國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交錯。之所以選擇《史論》，除了因為它的論旨與目的明確，為本文的問題意識提供了絕佳的材料之外，也因為其作者威廉·羅伯遜作為十八世紀最重要的史家之一，在當代史學史研究中卻不若同時期的休謨、吉朋乃至伏爾泰一般受到重視。即便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史論》也常在史家的討論中缺席。¹⁰本文對

⁸ 詳見下文第二節的討論。

⁹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6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2015).

¹⁰ 例如 David Womersley 在經典的研究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Robert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3 (1986): 497-506 中，便全然忽略了《史論》。而在目前羅伯遜史學研究的重要論文集：*William Robertson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ed. Stewart Brown (Cambridge: Cambridge

《史論》的分析，除了有著啟蒙史學史研究的價值外，亦有助於學界對羅伯遜與蘇格蘭啟蒙歷史文化的認知。

本文扣除導論結論，共分兩節。第一節探討《史論》的雙元論述脈絡，分析史論如何繼受英國殖民印度初期對印度文明的辯論，同時也分析《史論》與這場辯論如何體現啟蒙史學論述中，藉由法制史的寫作來反思政治辯論的特質。更具體來說，這一節將指出，十八世紀東方專制論述與法制史的古憲法論述，如何構成十八世紀英國對印度究竟是法治文化還是專制文化的辯論。¹¹重構了「寓政治辯論於法制史書寫」的啟蒙史學論述後，下一節則分析羅伯遜在《史論》中，如何明確挪用此史學史辯論，並藉由古憲法的法制史語言來反駁古印度是專制帝國的論述。在結論中，本文將總節全文論點，重申「史學作為政治思想」的論旨，並指出歷史作為一種思維模式，如何具體蘊含於十八世紀的歷史書寫之中。

羅伯遜的《史論》書成於 1791 年。其內容上從波斯帝國與古印度文明之交流開始，直下十八世紀英國正式介入殖民印度時期。有別於羅伯遜其他三部歷史著作，《史論》的特殊之處在於，這並不是一本關於特定地域的歷史。在《史論》開書第一段裡，羅伯遜直言《史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對《史論》的分析也僅出現在幾篇論文之中。晚近最新的研究成果，羅伯遜的第一本現代傳記也僅有五頁的篇幅討論《史論》：Jeffrey R. Smitten, *The Life of William Robertson: Minister, Historian, and Princip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227-232.

¹¹ 本文在此所指出的法治文化，是指古憲法為社會提供了法治(the rule of law)保障的基礎。十八世紀英國法治史學者多認為，古憲法所提供的法治文化，是十八世紀英國人對英國法政體系特有的信任心態。可參見：David Lemmings, *Law and Government in England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11.

論》的宗旨與目的，是在檢視古人對印度大陸的歷史知識，以及蘊含於這些歷史知識中，對印度不同王朝興替間社會、文化與宗教的理解。¹²換句話說，《史論》記錄了不同時空背景中，不同文明的人對於印度文明史的記述。與他最暢銷的史學名著《美洲史》與《查理五世史》相比，《史論》更當被定位成一本史學史的著作。至於羅伯遜的史學興趣，為什麼從歐洲與美洲史的書寫，轉向古印度的史學史反思，則是啟蒙史學史研究迄今難解的問題。學界目前對這個問題的詮釋，傾向於指出這是一部因應黑斯廷大審(The Trial of Warren Hastings, 1788-1795)所寫下的著作。學者卡奈爾(Geoffrey Carnall)便直言：「《史論》的立即書寫脈絡，正是延歷數年的黑斯廷大審。」¹³這論點其來有自。《史論》成書於 1791 年，正是黑斯廷大審的高峰，學界對《史論》的分析，更因此常著重於東印度公司於印度的殖民，以及東方學的學者對印度風俗地理的探索上。

這確實與《史論》的寫作密切相關。如羅伯遜自承，《史論》的創作動機源自羅伯遜閱讀英格蘭著名地圖學家詹姆士·雷奈爾(James Rennell, 1742-1830)的《回憶錄》。雷奈爾在 1764 年 4 月加入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軍事工程團隊，著手對恆河流域的探測工作，並在 1767 年受孟加拉總督(Governor of Bengal)羅伯·克萊夫(Robert Clive, 1725-1774)指派成為東印度公司於孟加拉地區的總量地官(Surveyor General)。在擔任總量地官的期間，克萊夫繪製了多幅孟加拉地區、恆河流域與印度半島的地圖，並於 1783 年出版成英國最早關於印度半島完整繪製的地圖集。

¹² William Robertson, *A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Concerning the Knowledge which the Ancients had of India: and the Progress of Trade with that Country prior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Passage to it by the Cape of Good Hope* (London: 1791), iii.

¹³ Carnall, "Robertson and India", 212.

¹⁴雷奈爾的地圖繪測工作，實受惠於東印度公司越發深入統治印度半島。伴隨著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與北印度的軍事與商貿擴展，東印度公司同時著手招募語言學、地圖學、乃至歷史學者前往印度半島，探測並研究當地的社會風俗，以利公司在當地經營。誠如著名印度史家貝利(C. A. Bayly, 1945-2015)所言，這與東印度公司追求掌握當地知識以因地制宜的統治方針息息相關。¹⁵廣邀學者的結果，是構成所謂「英國東方學學者」(British Orientalists)的研究社群，他們的研究成果則反饋回東印度公司的治理模式。這意味著自 1760 年代開始，對於印度文明的知識開始藉由東方學者的著作出版於英國流通。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東方學者對印度的研究，除卻以翻譯印度文學經典為大宗外，亦包涵不少印度文明史的史料譯介。這批印度史的史料成為十八世紀英國人所謂「古人」(the ancients)對印度文明的描繪。東方學者借重翻譯所謂「古人」對印度文明的知識，其實有明確的意圖。東方學者之一的亞歷山大·道(Alexander Dow, 1735-1779)在翻譯波斯史家費里西塔(Firishta, c. 1570-1620)的印度史時，就直言他這麼做是為了破除當時英國盲信「現代人」(the moderns)流於誇張的旅遊記事，進而產生對印度文明的諸多偏見與誤解。¹⁶這是一種以歷史論述反思現代偏見的批判。另一名東方學者納撒尼爾·哈勒(Nathaniel Halhed, 1751-1830)在翻譯《印度法典》(A Code

¹⁴ 雷奈爾與東印度公司的地圖繪測工作，參見：Matthew E.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3。

¹⁵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tie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4-54.

¹⁶ Alexander Dow, *The History of Hindostan,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Death of Akbar,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of Mahummud Casim Ferhista of Delhi, Together with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Brahmins* (London, 1768), xxi-xxii.

of *Gentoo Laws*)時也直言，他試圖藉此「(為歐洲人提供)關於印度人的風俗與禮儀的精確認知。極為不幸的是，他們的風俗文化長期蒙受西方世界的誤解。」¹⁷

東方學者將歷史作為批判的作法，與《史論》的目的不謀而合，《史論》的寫作也與東印度公司的殖民息息相關。正如本文第二節所示，《史論》的論述語言，更是與黑斯廷大審中，對於古印度文明究竟是古憲法政治抑或是東方專制的辯論相近。黑斯廷大審是一場發生於 1780 年代末期的政治審判，由時任文多弗(Wendover)下議員的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對甫卸任印度總督的華倫·黑斯廷(Warren Hastings)所提起的訴訟案。柏克於 1786 年 4 月 4 日到 5 月 5 日間，起草了二十二項指控黑斯廷在印度期間的不當作為，並呈交上下議院的全院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辯論，其中的六項指控被重新起草為彈劾議案呈交上議院，同時下議院也於 1787 年 5 月 10 日通過投票，指認黑斯廷當依彈劾議案的內容被起訴。於 1787 年 5 月 17 日，柏克原始草案的第十六項指控，指認黑斯廷指示東印度公司在奧德土(Oudh)的軍事行動，被擴列成十三條細項加入彈劾議案，使得議案最終以二十二條指控上呈上議院。黑斯廷的大審盤據了英國政治輿論，直到法國大革命爆發奪走了焦點。對黑斯廷的指控可以粗分成四大主題，分別是黑斯廷在貝納瑞(Benares)與奧德土的政策與行徑，以及他收受當地人贈禮與簽訂各式有害當地人利益卻圖利自我的契約。¹⁸

¹⁷ “(To present) a precise idea of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se people (i.e. the Hindus, for the Europeans), which, to their great injury, have long been misrepresented in the Western world.” Nathaniel Halhed, *A Code of Gentoo Laws, or Ordinations of the Pundits, from a Persian Translation Made from the Original Written in the Shanscrit Language* (London, 1776), xi.

¹⁸ 關於黑斯廷大審，最經典的研究是 P. J. Marshall, *The Impeachment of Has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與 Geoffrey Carnall and

審判曠日廢時，直到 1795 年，黑斯廷獲判無罪。

黑斯廷大審的主軸是大英帝國之於合理殖民統治的理解。但什麼樣的殖民統治稱得上是「合理的」，則又必然關係到殖民者對殖民地的認識。這尤其表現在柏克與黑斯廷對印度文明爭鋒相對的理解之上。例如，當黑斯廷面對議會指控他於貝納瑞的治理過度嚴苛，致使 1781 年的貝納瑞起義(The Benares revolt)時，黑斯廷申辯：「整個亞洲的歷史不過是個前例，證實了專斷權力在亞洲的行使不曾改變過。」¹⁹黑斯廷如此言說的目的，是在強調他在印度採取的統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各邦依循既有統治文化為原則。在大審後期，柏克批判了黑斯廷的辯護之語。柏克在下議院援引了前文提及哈勒所翻譯的《印度法典》，指出印度文明儘管歷經政治史上的變遷，卻保存既有的法治文化。他進而以帖木兒為例，指出即便慣常被歐洲視為專制帝國的帖木兒帝國，在印度半島亦受到當地法治文化約束。²⁰柏克在此重申他在大審開庭演講的主旨，強調管轄印度當地人的法治文化甚是古老，

Colin Nicholson eds., *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Papers from a Bicentenary Commemor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關於柏克與黑斯廷大審的關係，可參見：Richard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821-850。

¹⁹ “The whole History of Asia is nothing more than Precedent to prove the invariable Exercise of arbitrary Power.” Warren Hastings, *The Defense of Warren Hastings, Esq. (late Governor General of Bengal), at the Ba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upon the Matter of the Several Charges of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Presented Against Him in the Year 1786* (London: 1786), 106.

²⁰ 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II, ed. P. J. Mars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267-281.

也因此比任何一名歐洲君主所頒布的法律更有效力。²¹對於統治印度的政治傳統，究竟是專斷權力抑或是法治文化，涉及了一個核心議題，即黑斯廷在貝納瑞的統治，究竟是符合當地政治文化的治理，還是使當地人淪為奴隸的暴政。黑斯廷為自己辯護時，以前者為尊，柏克的指控則認為黑斯廷無疑是後者。在柏克看來，正是黑斯廷與東印度公司的介入，迫使原本享有傳統法治文化治理的印度人淪為東印度公司壓迫的對象。換言之，柏克指控東印度公司才是破壞法治文化的專斷權力的行使者。²²

《史論》的書寫與黑斯廷大審中，對於印度是法治還是專制的辯論息息相關。兩者最大的關聯，是《史論》的書寫與黑斯廷大審共享了同樣的「論述脈絡」(the discursive context)。「論述脈絡」的概念，是由史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所提出。波考克藉此指出，政治思想史的書寫應當是論述史的寫作。原因在於，所謂的思想與觀念往往透過書寫來呈現，而書寫又必然受到寫作者的語言所侷限。這表示思想勢必受語言形塑。波考克進而區分兩種不同的語言。第一種是如中文、英文、拉丁文這類的自然語言。他更關注的是第二種意義下的「語言」。這「語言」所指的，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受不同社會文化與風貌影響所產生的，只屬於該時空與社會的論說方式。這種論說方式會存在特定的語言結構，使用特定的片語與修辭，使得論說具備唯有共享或認識該語言結構的人，才能夠在不需要多加解釋的情況下理解論說的內容。波考克認為，是如斯意義下的「語言」，塑造了思想如何被表述以及被書寫的方式。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政治思想史應當被理解為思

²¹ 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I, ed. P. J. Mars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353.

²² 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II, 260-261.

想如何在特定的語言結構裡被論述的歷史。這也表示思想史家的工作與哲學家存在決定性的差異，史家當爬梳分析的，是使得思想被論述成為可能的「論述脈絡」。²³舉例來說，當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在《理查二世》(*Richard II*)裡，呈現出「國王已死，國王萬歲！」(“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的舞台陳設時，對莎士比亞書寫時代的論述脈絡有所認識的讀者，可以輕易地理解到莎士比亞在此與他同時代的觀眾所共享的，是當時關於王權的特定法律語言，即所謂「王的兩種身份」(*The King's Two Bodies*)。²⁴不了解這個語言結構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困惑，為什麼前一句話剛說國王已死，下一句話又宣稱國王享有長生。然而，共享或瞭解這個論述脈絡的受眾卻可以輕易理解，《理查二世》所傳遞的訊息，是儘管當前身居王位的自然人終將一死，但

²³ Pocock,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owar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67-86; and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étier d’Historien: Some Considerations on Practice,” in Pocock,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87-105.

²⁴ 這是歐洲法制史上的常識論述，本文無意深探，僅以此為例做說明。經典的研究可見：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4-41.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國王已死、國王萬歲」慣常被學者用來作為《理查二世》的劇場表現，且也被十六、十七世紀受眾接受(參見最近研究如：Fernanda Moura,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Shakespeare’s *Richard II* and Its Early Stage History,” *Scripta Uriandrade* 17:3 (2019): 125-140)。但在《理查二世》的劇本裡，莎士比亞並沒有明確寫下這句箴言。“The King is dead”一句僅餘第二幕第四景，由威爾斯船長的角色在意圖背叛理查時說出口。“Long live the King”一句則不曾出現，最接近的表述是第四幕第一景，當理查讓位於博林布魯克(Henry Bolingbroke)時，說出「願你長生坐於理查之王座」(Long mayst thou live in Richard’s seat to sit)。參見：William Shakespeare, *The Oxford Shakespeare: Richard II*, eds. Anthony Dawson and Paul Yachn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1-202, 246。筆者感謝編委會建議澄清此段。

乘載著君王權柄的「國王」這個法律身份，並不會隨著自然人的死亡而消散。當身為現任國王的自然人死亡時，「國王」的法律身份會持續存在，等待下一位自然人繼位肩負起這個法律人格。

《史論》與黑斯廷大審共享了幾個明確的論述脈絡，其中之一是對於何謂好的殖民治理的理解。如前所示，儘管黑斯廷與柏克在大審之中立場敵對，但兩人皆認同好的殖民治理，是必須在深度認識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後，依循當地既有的政治傳統擬定的治理方針。正是因此，東印度公司才延攬東方學學者，考察印度歷史文化與風土民情。羅伯遜在《史論》的結語留下的文字，也反應出他共享東方學學者的關懷，試圖藉由引介印度的歷史文明，來破除當時英國人普遍對印度的偏見。²⁵但除此之外，黑斯廷大審與《史論》最息息相關的論述脈絡，則是柏克與黑斯廷對印度文明究竟具備什麼樣的政治文化的認知差異。柏克與黑斯廷辯論的癥結點，在於印度文明在歷史上所展現的政治文化，究竟是如柏克所說的法治文化，還是如黑斯廷所強調的專制統治。這兩種相異的認知源自同樣的十八世紀英國憲政辯論裡獨特的語言結構，即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與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的論爭。需要強調的是，這個論爭並不是由柏克與黑斯廷所提出，而是柏克與黑斯廷在大審的答辯與辯論裡，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這樣的語言結構與論述脈絡。同樣地，羅伯遜在書寫《史論》時也使用了這樣的語言結構，以期望能達到消解讀者對印度的偏見並改善印度的處境。是在此意義上，《史論》與黑斯廷大審共享了同樣的論述脈絡。本文接下來將進一步說明這個論爭的內容，以及《史論》如何使用了論爭的語言。

²⁵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336.

二、《史論》的雙元脈絡

本節將重建《史論》的兩個論述脈絡，指出《史論》共享了其他啟蒙史學書寫中的特質，尤其是將當代政治辯論訴諸於法制史寫作，以針砭時政是否具備合法性的史學書寫風氣。本節的論證較為複雜，故可再細分成兩個小節。第一是指出黑斯廷大審中，柏克與黑斯廷的辯論，挪用了啟蒙史學史上關於專制政治與古憲法政治的辯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孟德斯鳩對專制政治與古憲法政治的觀點。確立了這一點，能指出《史論》與黑斯廷大審共享同樣的「專制政治—古憲法政治」的論述脈絡。這之後，本節將進一步爬梳，「專制政治—古憲法政治」的辯論，如何可見於啟蒙史學書寫的一大辯論之中，即法國政治是否屬於古憲法政治的法制史爭論。

（一）古憲法與東方專制

就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語言而言，關於古憲法與東方專制的辯論最常被提及的論述基礎，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對亞洲專制政體與英格蘭自由政體的分析。對於孟德斯鳩的分析，在十八世紀英國政治論述裡的深刻影響，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十八世紀英國最為暢銷的著作之一：威廉·布萊克史東的四卷《英格蘭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這四卷的《英格蘭法》在1765年11月到1770年間分冊出版，其中第一卷的首刷一千五百冊在短短三個月內售罄，甚至在第三卷與第四卷出版前，前兩卷的合售版便已經再刷至第四版，每一版的發售量均在一千五百冊到三千冊不等。如此銷售熱潮使布萊克史東光憑《英格蘭法》便取得將近一萬五千英鎊(相當

於現今約一百三十萬英鎊)的收入。²⁶而布萊克史東在《英格蘭法》中，直接挪用了孟德斯鳩對英格蘭憲政的分析，更是使得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的論述，成為十八世紀政治論述的常調。舉例來說，布萊克史東在論及下議會時，提到：「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任何一個被視為自由人的人，都應當在某些程度上被視為自身的管理者。因此在立法權的配屬中，至少有一部份的權力應該屬於人民全體。」²⁷布萊克史東在如此論述時，並沒有特別援引孟德斯鳩，但這無疑是《論法的精神》第十一書裡論及英格蘭憲法時的論述：「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每一個人皆被視為擁有自由的靈魂，故而應當管理自身，這使得人民作為一個群體，應當享有立法的權力。」²⁸這種語言結構上的相似性，表現了孟德斯鳩的分析如何成為十八世紀英國的特定憲政語言。孟德斯鳩對蘇格蘭啟蒙的影響已是學界公認，²⁹本文不再贅述，僅將聚焦

²⁶ Wilfrid Prest, "General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4 Vols., ed. Wilfrid Pr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²⁷ "In a free state, every man, who is supposed to be a free agent, ought to be, in some measure, his own governor; and therefore a branch at least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should reside in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106.

²⁸ "As, in a free state, every man, considered to have a free soul, should be governed by himself, the people as a body should have legislative power..."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59.

²⁹ Silvia Sebastiani, "Beyond Ancient Virtues: Civil Society and Passions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2:5 (2011), 821-820; Paul Cheney, "Lumière écossaises," *Dictionnaire Montesquieu* (en ligne), dir. Catherine Volpilhac-Augier (2013): <http://dictionnaire-montesquieu.ens-lyon.fr/fr/article/1376427088/fr/> (accessed 20 May 2022); Fania Oz-Salzberge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s. Alexander Broadie and Craig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孟德斯鳩對《史論》以及柏克與黑斯廷在大審中的論爭所提供的重要論述脈絡：古憲法與東方專制論。

黑斯廷對治理印度必須依循當地政治文化，因此有效治理必須建立在對印度文明的認識之上的原則，與他對印度是專制政治的判斷並不衝突。視亞洲的政治文化為專制政體，正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政體分析在十八世紀歐洲最深刻的影響之一。在《論法的精神》裡，孟德斯鳩將人類政治社群的政體區分為共和政治、王權政治、與專制政治。其中共和政治又可以再進一步區分成貴族式與民主式的共和。孟德斯鳩對民主式共和、貴族式共和、與王權政治的分析，轉化了時人熟悉的亞里斯多德式分析模式。³⁰在原本亞里斯多德式的框架裡，政治社群被按照統治者的數量區分成單人統治、少數統治、與多數統治三類，並依照治理的優劣分別成「王權政治／暴君政治」、「貴族政治／寡頭政治」、與「共和政體／民主政治」，這六種型態的政治又各自具備獨立的運作原則。³¹孟德斯鳩轉化亞里斯多德之處，在於

Press, 2003), 151-176.

³⁰ 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自十二世紀中葉以後，藉由學者評註而成為歐洲大學教科書，即所謂亞里斯多德著述系統(Corpus Aristotelicum)。這使得亞里斯多德對自然與政治的分析與分類，逐漸成為文人社群共享的論述脈絡。晚近學術史與科學史的成果則指出，即便十六世紀開始，歐洲大學開始陸續進行教科書改革與教席改制，亞里斯多德的著述依然存在著普遍的影響：C.B. Schmitt, *Aristotle and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achiko Kusukawa,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Philosophy: The Case of Philip Melanch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D. A. Lines, *Aristotle's Ethic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a. 1300-1650):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 Education* (Leiden: Brill, 2002); Dmitri Levitin, *Ancient Wisdom in the Age of the New Science: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in England c. 164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³¹ 參見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臺北：聯經，2013)，第一章。

他將亞里斯多德式「單人／少數／多數」的三類分析，縮減成單人與多人統治兩類，再細分成「王權／專制」與「貴族共和／民主共和」。與亞里斯多德不同的是，孟德斯鳩對政體的區別，不僅基於對主權者人數的區別，而是建立在法律體系的分辨。與亞里斯多德相仿的是，孟德斯鳩也指出這四種不同的法律體系依據不同的原則運作。在孟德斯鳩的分析架構裡，除卻王權、貴族共和與民主共和這三種型態的政治是延續了亞里斯多德式的政治分析之外，他引介了一種新政治形態，即專制政治(Despotism)。孟德斯鳩指出，專制政治將國家的政體維繫於主權者一人的意志，它與另一種單人統治的政體(即君主政治)不同。君主政治的運作得仰賴貴族為中介，政策方得以落實。換句話說，君主政治儘管是一人統治，但主權者權威的範疇及其實踐，將受制於貴族。在孟德斯鳩眼中，這使得君主政治裡的政治權威並非毫不受法律約束。³²然則專制政體中，君主的權威並不受制於任何社會規範。這是因為專制政治有著獨特的運作原則，而該原則分別仰賴了三個外在條件。第一是人民必須處於某種未開化的野蠻狀態，其次是這樣的政治必須存在於炎熱濕潤的地理與氣候環境，第三則是送禮的風俗與文化。

專制政治的原則純粹出自人民對統治者的恐懼，恐懼的原則則與這三種外在條件相輔相成。孟德斯鳩指出，專制政治的運作，之所以不需要過多的成文法律條文，在於專制政治中的人民是「畏縮、無知、與消沈」的。在他看來，治理這樣的人民，與飼主豢養野獸無異。統治者只需負責人民溫飽，人民也不具備充分的理性反思統治者的治理模式。最合宜的管理方式是基本的賞罰，過度複雜的規則與體系反而

³² Aurelian Craiutu, *A Virtue for Courageous Minds: Moderation in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1748-18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3-68.

會使這樣的人民無所適從。³³然而，人民之所以會處於這種與野獸無異的狀態，又與這群人居住的氣候環境有關。孟德斯鳩指出，專制政治通常只會發生在氣候炎熱之地。³⁴這是因為炎熱的氣候影響了人類的體質。孟德斯鳩結合了承繼自荷蘭醫師赫曼·布爾赫夫(Herman Boerhaave, 1668-1738)的體質學研究與十八世紀法國的環境書寫，構成他奠基於氣候決定論的體質人類學，以及由此體質人類學發展而來的政治分析。³⁵孟德斯鳩認為，過於炎熱的環境會促使人體的血管擴張，進而使得血液流速趨緩，這將使得居住於炎熱環境的人們有著更細膩的感官與情緒感受，卻也更容易耽溺於男女性事，於生活中其他事務的表現趨於遲緩態度慵懶。³⁶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孟德斯鳩對氣候決定論的觀點，並不是種族主義式地認為特定人種必然有著更容易接納專制政治的特質，他只強調人類的體質必然會受到居住的環境影響。例如，孟德斯鳩在強調印度人由於受到南亞濕熱環境的影響流於畏縮與慵懶的同時，也指出如果歐洲人自幼就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他們的體質也會受到這樣的氣候影響。³⁷在欠缺明確的成文法律體系與對應的政治運作原則，以及人民傾向怠惰的情形下，孟德斯鳩指出在專制政治裡，唯一能夠制約統治者權威以及鼓勵人民積極行動的，是當地的

³³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59.

³⁴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64.

³⁵ Jean-Patrice Courtois, "Le Physique et le Moral dans la Théorie des Climats de Montesquieu," in *Le Travail de Lumières*, eds. C. Jacot Grapa et al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2), 139-56; Denis de Casabianca, "Une Anthropologie des Differences dans L'Esprit de Lois,"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75 (2012): 405-423.

³⁶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33-234.

³⁷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34.

風俗文化。³⁸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送禮的風俗。孟德斯鳩認為，這是因為專制社會欠乏了法治秩序下明確的獎懲機制來促成人民行動的動機。在專制社會裡，君主與臣民一致地皆受到送禮文化的制約，唯有藉由送禮才能使當地人得到行動的充分理由。³⁹

孟德斯鳩依據他的體質人類學，得到亞洲總是會出現帝國，且帝國總會發展出專制政治的結論。⁴⁰他特別舉出的例子是中國與印度，並區辨兩者。孟德斯鳩指出，儘管兩地的氣候都使得當地人的體質傾向怠惰，但印度與中國發展出不同的風俗文化。印度的立法者「佛」(Foe)順應著人民的習性，發展出強調平靜與空無的宗教文化，強調人無作為的消極狀態是完美的和平狀態。孟德斯鳩認為，這樣的作為雖然依循了印度人的習性，卻也使得唯一能抑制專制政治的風俗助長了印度人的怠惰。在孟德斯鳩看來，中國的立法者與印度相反。中國的立法者意識到人民的怠惰傾向，刻意塑造了促使人民勞動的宗教風俗，⁴¹這尤其顯現在土地的使用與擁有權上。孟德斯鳩強調，中國的皇帝每年都會進行耕地祈求豐收的祭典，並以身作鼓勵人民勞動耕作自身所佔有的田地。印度的統治者則將土地收歸己用，使得人民在失去土地擁有權的意識下，更加欠乏勞動的動機進而習於安逸。⁴²在孟德斯鳩對東方的專制政治的分析裡，印度這種後設風俗助長先天體質傾向的狀況，使得印度即便在東方專制的政治裡，也成為某種特例。印度的特殊之處也表現在政治樣貌上。相比十八世紀亞洲的專制政治，印度已經不再存有帝國的政體，失去強大中央集權政府使得專制政治在

³⁸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61-62.

³⁹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67.

⁴⁰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82-284.

⁴¹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36.

⁴²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36-237.

印度的樣態，比其他亞洲帝國更顯腐化。⁴³換句話說，根據孟德斯鳩的分析，與其他亞洲帝國的專制政治相比，十八世紀的印度的政治環境更為惡劣。那是一個腐化的專制政治。

孟德斯鳩對專制政體與君主政治的分辨，也正是柏克與黑斯廷對印度政治文化看法差異的基礎。⁴⁴當黑斯廷在為他於貝納瑞的治理方針辯護時，便直言：「我不知道我們要如何反駁，蒙兀兒帝國的政府組織存在著許多專制政治的原則。只要這些原則所在之處，君王的權力即為一切，而臣民的權利則為烏有。」⁴⁵不僅如此，接受東印度公司指派前往印度的東方學學者，也有不少人承繼了孟德斯鳩論述印度與東方專制的語言。亞歷山大·道在他所翻譯的費里西塔的《印度史》裡，附錄了一篇他對印度政治史發展的論文，論文標題即是：〈論印度斯坦專制政治的起源與本質〉（“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Despotism in Hindostan”），論文的開篇第一段便是一段孟德斯鳩式的論述語言：「印度炎熱的氣候導致了怠惰，使得當地人流於閒滯安逸的生活，也使得他們認為專制政治的邪惡，遠不及自由所必須付出的勞動。」⁴⁶道的論文與孟德斯鳩的論述相仿，同樣地區分了亞洲不同的專制政體，並指出印度的現狀處於某種腐化的專制政治。道對印度政治文化

⁴³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271.

⁴⁴ 孟德斯鳩對專制政治的論述對十八世紀智識文化的影響並不只表現在黑斯廷大審上。中文學界對此的經典研究是：陳正國，〈從專制到東方專制——十八世紀英國殖民進程與東方專制論的源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4（臺北，2017）：917-995。

⁴⁵ Hastings, *The Defense of Warren Hastings*, 91.

⁴⁶ “The languor occasioned by the hot climate of India, inclines the native to indolence and ease; and he thinks the evils of despotism less severe than the labour of being free.” Dow,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Despotism in Hindostan,” in Dow, trans., *History of Hindostan*, Vol. III, vii.

的認知，與他試圖藉由研究印度文明來改善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偏見並不衝突，也與黑斯廷的態度相似。他們都致力於改善印度的處境，但在他們看來，改善唯有建立在正確認識印度既有的政治文化之上。誠如黑斯廷在面對東印度公司介入貝納瑞政局的指控時自承：「我們所面對的是交織在蒙兀兒政府結構內的缺陷。如果(東印度公司的介入)能讓亞洲人脫離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的專制制度，並由英國立法的自由精神取代，這將會是最讓人振奮的事情，而我也會萬分滿足地面對眼前對我的指控，如果這麼做將加快促成這件有益於人類福祉之事。」⁴⁷正如史家所指出的，這種接受了氣候決定論與專制政治論述對印度政治社會與宗教文化的理解，夾帶了東方學學者自身的偏見。⁴⁸但與此同時，這種偏見卻也是不少十八世紀身歷印度的英國人的認知。在羅伯遜寫作的年代，人們普遍認為印度處於腐化的專制政治情境，因此需要外力介入，在符合當地專制政治的文化傳統上，引介一定程度的英國法治精神。

孟德斯鳩對十八世紀英國政治語言的影響並不僅於專制政治，也在於古憲法論述。柏克在抨擊黑斯廷與東印度公司的論辯裡，即使用了古憲法論述的政治語言。古憲法論述除了孟德斯鳩的洞見之外，也存在於十七世紀英格蘭以降的論述脈絡中。⁴⁹古憲法的語言使得柏克

⁴⁷ "... it is a defect woven into the texture of the Mogul system. It will, no doubt, be most happy for the inhabitants of Asia, when the despotic institutes of Jengheez Khawn, or Tamerlane, shall give place to the liberal spirit of a British legislature; and I shall be amply satisfied in my present prosecution, if it shall tend to hasten the approach of an event so beneficial to the great interests of mankind." Hastings, *The Defense of Warren Hastings*, 102-103.

⁴⁸ P. J. Marshall, ed., *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Hindu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3.

⁴⁹ 關於古憲法的政治語言，最經典的研究是 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得以論證，如印度這樣有著深厚歷史背景的古老政治文明，即便在當下可能不存在某種如歐洲明確的成文法體系，但在當地依舊存在某種獨特的法治文化，使得印度必然不是專制政治。正如柏克在大審開審演說中所說：「他們(印度人)的立法者，不管他是誰(他的身份早已佚失在古遠的迷霧裡)，視將人民與土地連結作為他的政治的第一原則。」這使得印度的政治與法治文化與英國有了根本的差異，因為「有時候我們(英國)的宗教法殊異於我們的法律，有時候我們的法律殊異於我們關於社會榮譽的律則。但那個國家(即印度)關於宗教的法律、國家的法律以及社會榮譽的律則都被鞏固在同一個名為種姓制度的系統裡，而這個系統的規則將永遠規範那塊土地上的人。」⁵⁰柏克進而比較了種姓制度與十八世紀英國貴族社會，指出英國除了世襲貴族之外，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們構成了一個整體，但在印度，人們被分成四種共同體(Commonwealths)，在不同共同體之間並不會產生流動。這種從不可考的古代延續迄今的制度確立了印度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一個人一旦犯下有害自身共同體的行徑，這個人將不會被貶到下一層的階級，而是被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2nd edn. with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對於英國史學界近年成果的綜述可見：Mark Goldie,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2:1 (2019): 3-34.

⁵⁰ "The legislator, whoever he was (for that is lost in the mists of a very obscure antiquity) had it as the great leading principle of his policy to connect the people with their soil... For sometimes our laws of religion differ from our laws of the land; sometimes our laws of the land differ from our laws of honour. But in that Country the laws of religion, the laws of the land and the laws of honour, are all united and consolidated in one, and bind a man eternally to the rules of what is called his *caste*." Burke, "Opening of Impeachment,"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 VI, 301-303.

徹底排除在整個種姓(caste)的秩序之外(out cast)。⁵¹

柏克這番論述包含了三個重要的論點。第一是印度存在著源自古代無可追溯的法治秩序。這種現在社會依然存在著某種源自遠古以致難以溯源的秩序的語言，正是「古憲法」政治語言的標誌。如古憲法學者波考克所指出的，「(英國的)普遍法就定義來說即是古遠(immemorial)的風俗。」⁵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與羅馬法這類存在明確法典的成文法體系不同，古憲法所訴諸的是相關案件與相關原則的前例，而這些前例可能出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最後逐漸積累成足資眼前特定案件作為法院判斷基準的材料。這樣積累的過程，使得古憲法與羅馬法存在著兩點差異。差異之一是古憲法的論述認為，一個擁有古憲法的社會將不像具備明確成文法體系的社會(如承襲羅馬法傳統的歐洲)，得以訴諸如查士丁尼法典這類具備明確系統性的法源依據。差異之二則是擁有古憲法的政治社會表示這個社會的法治秩序，是允許社會的法源依據隨著社會的歷史發展與時俱進的。在十七世紀英格蘭古憲法論爭的重要著作中，法制史家馬修·海爾(Sir Matthew Hale, 1609-1679)便在其確立英格蘭古憲法論述的重要著作裡提及「那些古老的，在人類記憶之前就被確立，而被歸類為不成文法(Leges non Scripta)或風俗的國會法案」。⁵³柏克將他對種姓制度的敘述訴諸於古憲法的語言，有可能期望能夠使得他演說的受眾得以與英格蘭普通法連結而產生共鳴，進而產生印度也是具備古憲法的政治文化的文明的意識。⁵⁴

⁵¹ Burke, "Opening of Impeachment,"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 VI, 303.

⁵² Pocock, *Ancient Constitution*, 37.

⁵³ "Those ancient Acts of Parliament which are rang'd under the Head of Leges non Scripta, or Customary Laws, as being made before Time of Memory..." Matthew Hale,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2nd edn. (London: 1716), 4.

⁵⁴ 柏克深諳古憲法的政治語言，也明確認識到這個語言在英國國會與政治文

第二個論點則是奠基於前述古憲法論述的挪用。柏克如此言說，同時也表明了印度作為一個古憲法秩序存在的社會，其古憲法的精神被保存於社會風俗之中，構成了雖然不必然是成文律法，卻足以約束上層權力的規範關係。同樣地，這也是古憲法的政治語言的特質。以十八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古憲法著作布萊克史東的《英格蘭法評述》為例，在論及君王的權力時，布萊克史東如此寫道：

君王在處理國內事務時的另一項職能，是作為正義的泉源與王國和平的主要確保者。然而當法律指稱君王作為正義的泉源時，這並不意味著君王是正義的創造者或正義的根源，而是指君王作為正義的分配者。正義並不來自君王，彷彿是君王恩賜的禮物……君王並不是正義的泉源，而是儲藏正義的蓄水池……根據社會的基本原則，藉由司法確保正義的權力歸屬於社會整體。但因為藉由人民作為一個整體來確保社會裡的每個人得享正義將顯得不切實際，各個國家才會選認出特定的管理者，並交付他們這項權力……⁵⁵

Another capacity, in which the king is considered in domestic affairs, is as the fountain of justice and general conservator of the peace of the kingdom. By the fountain of justice the law does not mean the *author* or *original*, but only the *distributor*. Justice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king, as from his *free gift*... He is not the spring, but the reservoir... The original power of judicature, by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ociety, is lodged in the society at large: but as it would be

化的特殊意義。見 J. G. A. Pocock, "Burke and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 (1960): 125-143;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160-222.

⁵⁵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171-172.

impracticable to render complete justice to every individual, by the people in their collective capacity, therefore every nation has committed that power to certain select magistrates... (斜線為文本原有。)

這意味著古憲法的原則根植於社會，而君王司法與執法的權力正是基於確保古憲法的完善而存在。君王的權力因此受到社會的原則所約束。換言之，只要古憲法的法治秩序存在於特定的政治文化裡，則該政治文化的君王必然不會是一名權力不受侷限的專制君主。柏克在開庭演說裡，以帖木兒為例指出了根深於印度社會的古憲法秩序如何有效約束了帖木兒，使得帖木兒在確立征服之後，仍舊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印度既有的種姓制度與法治秩序維繫統治。這使得「印度人不是被征服的人民。尤其與那些君王獨享絕對的統治權威，而廣大的人民毫無特權的地方相比，他們明確地保有那高貴的獨立特質，有著自由的精神與良好的政府。」⁵⁶

這導向柏克的第三個論點。一旦人們能夠以古憲法的認知為基礎，認識印度的政治、法律、宗教與社會秩序，那麼包含黑斯廷與東方學學者在內所說的印度現行的「腐化」狀態，應當被理解為外力介入並破壞了當地既存的古憲法秩序的結果。而柏克在演說中對印度政治史的簡明爬梳裡，借用了包含道與奧爾姆在內不少東方學學者共享的觀點，強調這種介入與腐化起於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伊斯蘭教的傳入。但柏克進一步開展他的批評，強調黑斯廷所主導的東印度公

⁵⁶ “They were no conquered people. They carried the evident marks of a noble independency, of a spirit of freedom and good government, as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 prince is armed with supreme entire authority, and where the great people have no privileges at all, or having privileges are nothing but subjects.” Burke, “Opening of Impeachment,”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 VI, 309.

司介入印度政局的作為，無異於蒙古人與伊斯蘭教的入侵，因為他們都破壞了印度文明的古憲法秩序。藉由將東印度公司與伊斯蘭帝國並陳，柏克翻轉了黑斯廷的專制政治語言，指出東印度公司在黑斯廷主政下，反而是以專制帝國的樣態侵犯了印度古老的古憲法秩序。⁵⁷

柏克如此言說，指涉了古憲法政治語言中的另一個原則：古憲法的自我修復機制。一個存在古憲法的政治社會，儘管在其漫長的政治史發展中可能存在法政崩壞的瞬間，但古憲法根深於當地社會的特質，將會使得社會本身蘊含了修復法政秩序的能力。例如，布萊克史東在評述英格蘭的古憲法時便提及，正因為英格蘭的法律源自難以追溯的過往，使得英格蘭的法治文化根深於英格蘭，與其政治與社會同時存續，這也意味著即便英格蘭歷史發展上不乏君王暴政的時期，但這些破壞古憲法秩序的行徑與法案，最終將被根深於社會的古憲法原則修復。⁵⁸布萊克史東舉出的例子，是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被剝奪王位的事件。布萊克史東指出，英格蘭並不存在任何的成文法條明文指出，君王一旦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將使得議會與人民有成文法賦予的合法權利剝奪君王的權位。然而，英格蘭根深於社會風俗的古憲法，使得當詹姆士二世的行徑破壞了君王應當保護臣民的原則時，英格蘭人得以在古憲法的基礎上採取行動迫使君王退位。更有甚者，這個事件將為往後的英格蘭人留下明確的先例，使得古憲法促成社會自我修復的規範有更強的效力。⁵⁹柏克在演講中不斷強調印度古憲法的當地(local)特質，正是訴諸於古憲法論述裡，這種強調社會風俗自我修復的論點。他以印度古憲法的當地性作為伊斯蘭帝國與東印度公司這類外力介入的對照，成為他強調伊斯蘭帝國在前與東印度公司在後的外力

⁵⁷ Burke, *Writings and Speeches*, Vol. VI, 307-312.

⁵⁸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48-51.

⁵⁹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151-153, 158-159.

干涉，不僅破壞了印度既有的古憲法秩序，甚至阻斷了古憲法秩序自我修復當地法政秩序的可能。這使得東印度公司推波助瀾地惡化了印度已然腐化的處境。

柏克的這三個論點以及他在開審演說裡訴諸的古憲法論述包含了兩種特質。首先是印度的法治文化與英國的普通法相仿，都源自記憶無法溯及的古代。如前所言，這是很標準的古憲法語言。在十七世紀英格蘭內戰期間，針對君王權威與議會主權的父權專政(Patriarchy)與古憲法辯論裡，古憲法論者(包含上述引用的海爾)在倡議法治文化時，便使用了這樣的表述方式。這是既存於英格蘭政治與法律文化的語言，例如歷經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與詹姆士一世(1566-1625)統治的法學家，也曾任王座法庭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的愛德華·寇克(Sir Edward Coke, 1552-1634)便在著名的《律法報告》(*Law Reports*)第七案裡指出，倘若不是根於遠古、蘊含前人智慧的律法流傳迄今，英格蘭人將會生活在沒有法治文化的幽暗裡。⁶⁰然而柏克演說中的論述不只是強調印度存在著古老的法治文化而已。他更進一步強調，這樣的法治文化存在於社會之中，並且構成了制衡君王的規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古憲法論述確實存在著這樣的暗示，但如柏克和布萊克史東這般明確指出社會法治文化的制約效果，卻是十八世紀古憲法論述的特質。而這與東方專制的論述相仿，皆有著來自孟德斯鳩的影響，尤其是《論法的精神》最後的第六部分，第廿六至第卅一書裡對法蘭西王國古憲法的法制史爬梳。⁶¹

⁶⁰ Sir Edward Coke, *Part Seven of the Reports: Calvin's Case*, in Sir Edward Coke, *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in Thirteen Parts*, Vol. IV, eds. John Henry Thomas and John Farquhar Fraser (London, 1826), 6.

⁶¹ 當然，這並不表示兩人並未受到十七世紀英格蘭古憲法論述的傳統影響，只是兩人將地理環境也涉入論述的內容，確實是孟德斯鳩的創見。關於孟

(二) 古憲法政治與法制史書寫

比起《論法的精神》其他部分(如第一部分論法的原則、第二部分第十一書論英格蘭憲政、第三部分的氣候決定論與第四部分論商業社會與文明)，孟德斯鳩在第六部分最後六書的法國法制史研究向來為史家與理論家忽略。⁶²然而這卻是孟德斯鳩致力最深的部分。他早在決意寫作《論法的精神》之前便開始蒐集法國法制史的相關史料，直到《論法的精神》初稿送印之際才在友人的鼓勵下動筆寫下餘下的篇章。孟德斯鳩甚至在與友人通信裡直言，這部分的篇章也許讀者只需要耗費短短三小時便能讀完，但書寫這些章節卻幾乎讓他白了頭髮。⁶³在《論法的精神》最末這幾書裡，孟德斯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駁斥曾經在路易十四在位期間出任外交官，並著述擁戴路易十四絕對專制(absolutism)政權的尚一巴提特·杜·博(Jean-Baptiste Du Bos, 1670-1742)。杜·博的辯護方式，正是透

德斯鳩對十八世紀英國古憲法論述的影響，可參見：David Liberman, *The Province of Legislation Determined: Legal Theor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31-55。

⁶² 少數的例外如 Annelien de Dijn 在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from Montesquieu to Tocqueville: Liberty in a Levelle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一書的第一章裡，花了近 20 頁的篇幅討論恩希·布倫維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1658-1722)與孟德斯鳩在第六部份對法制史的爬梳。而相較學界最常出版論及孟德斯鳩論英格蘭政體與東方專制的專著與論文，就筆者所知當前唯一聚焦討論孟德斯鳩對法制史研究的英語專著為：Iris Cox, *Montesquieu and the History of French Law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83)。法語學界的經典專著則為：Élie Carcasson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7)。

⁶³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240-242.

過政治與法制史的書寫，試圖藉由爬梳法國王座的歷史性來確立法國絕對王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這表示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最後一部份的著作，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古憲法辯爭、黑斯廷大審中柏克與黑斯廷的交鋒相似，都是在進行一場以歷史書寫為媒介的當代政治辯論。⁶⁴ 杜·博在他 1734 年出版的《法國王權創建史》(*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dans les Gaules*)中，藉由指出法國王權的建立，是不同王朝接續承繼了羅馬帝國遺留的法治秩序，進而強調法國王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存在於既存的法治關係。杜·博的論述最主要是建立在兩點，首先是不同的法國王室之所以得以承繼羅馬帝國的法治秩序，是因為他們受到被羅馬帝國統治的高盧人邀請進入高盧，實行統治以鞏固既有的法治秩序。其次則是不同王室的統治，皆被視為承繼了先前王室上溯至羅馬帝國時期的羅馬法秩序。舉例來說，杜·博引用了聖雷米及烏斯(St. Remigius, 437-533)給克洛維一世(Clovis I, 466-511)的書信裡恭賀克洛維時，提及「我並不意外見到您承繼了您先祖的偉業」這句話，作為聖雷米烏斯見證了克洛維入境高盧是承襲了他先祖即已享有的權威。⁶⁵

這樣的詮釋受到孟德斯鳩的抨擊，尤其是杜·博如何曲解關鍵史

⁶⁴ 孟德斯鳩所介入的是布倫維耶與杜·博對法國王權與法制史的史學史爭論。參見：Cox, *Montesquieu and French Laws*, 42-48; Harold A. Ellis, "Montesquieu's Modern Politics: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Monarchy in Old Regime Fra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0:4 (1989): 665-700; Keegan Callanan, *Montesquieu's 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88-101.

⁶⁵ "... je ne suis pas surprise de vous voir être ce que vos peres ont été... Nous remarquerons en premier lieu, qu'il s'agit d'un employ que les Peres de Clovis avoient tenu véritablement, mais où ce Prince étoit parvenu par sa moderation..." Jean-Baptiste Du Bos, *Histoire Critique de L'E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dans les Gaules*, Tom. II (Amsterdam, 1735), 326-330.

料。孟德斯鳩指出，聖雷米及烏斯的書信並沒有如杜·博所宣稱的一般，確認克洛維一世受邀進入高盧以實踐其先祖承繼至羅馬法的統治正當性。相反地，聖雷米及烏斯的書信不過是一般的對於君王戰事有成的祝賀。⁶⁶事實上，聖雷米及烏斯的信札更關切克洛維一世的作為，是否會服膺天主教會的原則：「現在的問題是，您是否會回應神意的呼喚，而正是神意獎賞您的作為並賜予您如此地位。這也是王權的終極目的。」⁶⁷孟德斯鳩藉此指出，杜·博所強調的，法國王權藉由克洛維一世所展現的承襲自羅馬帝國法治秩序的統治權威，仰賴的史料多為私人書信或克洛維與同時代其他統治者針對特定地區或事物的契約；杜·博曲解聖雷米及烏斯的書信絕非孤例。⁶⁸

為了深化他對杜·博的批判，孟德斯鳩重新梳理法蘭克人的法制史，並藉由法制史寫作重構法國王權政治的法治文化。孟德斯鳩認為法國法制史有三種重要特質：法制度的多元性、羅馬法的有限影響、以及內化成社會風俗的法治文化。他首先強調，法國法制史同時也是不同地域法蘭克人分支的歷史。包含勃根地法蘭克人、利普里安法蘭克人、撒利法蘭克人等分之在內，法蘭克人在高盧地區分別有著獨立的政治聚落也發展出不同的法治文化，這清楚地顯示在日耳曼人不同部族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法典差異。除此之外，這種多元並存的法治文化，又與日耳曼人的政治傳統以及羅馬帝國對高盧和日耳曼地區的統治方針有關。孟德斯鳩指出，即便在羅馬帝國統治期間，高盧地區的人們皆各自受到自身所屬的政治社群的法律管轄：羅馬人只受羅馬

⁶⁶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661.

⁶⁷ “Il s’agit maintenant de répondre aux vûes de la Providence, qui recompense votre moderation, en vous élevant à une dignité si éminente. C’est la fin qui couronne l’œuvre.” Quoted in Du Bos, *Histoire Critique*, 326.

⁶⁸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662.

法治理，同樣地撒利法蘭克人也只受撒利法典規範。⁶⁹孟德斯鳩如此論述法制多元性的同時，也是在指出羅馬法的統治侷限。⁷⁰相比於杜·博王權史觀強調高盧地區受羅馬法秩序所規範，存在著單一且系統性的法秩序，孟德斯鳩著重了高盧地區哥德部族法制史的多元性與不確定性。⁷¹他在描繪出羅馬帝國統治下高盧地區的基本法治框架後，也指出這樣的多元法秩序並非從一如是，而是在歷史長河中隨風俗影響而失能或進化。例如孟德斯鳩指出，隨著決鬥的風俗興起，以決鬥的結果判別是非曾一度使得高盧地區多元的司法機制失去作用。⁷²但與此同時，如決鬥這樣曾一度破壞既有司法機制的風俗也會隨著時光推演，內化成高盧地區法秩序與法治文化的一環，進而成就法國法制史上司法決鬥(judicial combat)的傳統。⁷³孟德斯鳩強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哥德部族的法治文化，與羅馬法這樣的系統性成文法典不同。哥德部族的法治文化在本質上是隨這些部族遷徙與發展過程所衍生的。換言之，哥德法秩序與部族文化息息相關，而這意味著法治文化與地域風俗成了一體兩面的關係。⁷⁴

不同的法制史書寫，為不同的政治論述提供了論證基礎。杜·博的史觀讓他得以論證法國絕對王權的根源，是因為法蘭克人受羅馬人之邀，前往高盧統治進而承襲了羅馬法的統治權威與統治正當性。孟

⁶⁹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532-536.

⁷⁰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537-540.

⁷¹ 孟德斯鳩在此所展現的，是歐洲法制史家指出近代早期歐洲所存在的法多元性(legal pluralism)，相關成果可見：Lauren Benton and Richard J. Ross eds., *Legal Pluralism and Empire, 1500-180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⁷²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554-559.

⁷³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561-574.

⁷⁴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546-548.

德斯鳩卻指出，杜·博如斯論述的關鍵根據，是上文提及的，由聖雷米及烏斯(St. Remigius, 437-533)給克洛維一世(Clovis I, 466-511)的書信，而這是杜·博曲解史料的成果。藉由凸顯法國法制史上的多元性、羅馬法的侷限、以及法蘭克人所承襲的，內化成地方風俗的法治文化，孟德斯鳩除了從根本上駁斥杜·博捍衛絕對王權的政治訊息之外，也同時點出他的核心政論：法國是法治文化根深於地方風俗的國度，這表示君王權威的行使必須仰賴存在於法治文化傳統中的中間機構(intermediate institutes)，尤其是貴族階級的存續，以及由地方貴族所組成專司司法與稅務的省級高等法院(Parlement)。正如孟德斯鳩在駁斥杜·博時直言的，當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2-565)任命克洛維一世為榮譽執政官時，「法蘭克人的王權早已確立，約束王權的法治規則也已完成。」⁷⁵孟德斯鳩對法國法秩序多元性與風俗性的法制史爬梳，支撐了他的核心政治關懷，即法國是法治文化約束王權的君主政治，絕非君王權威得以凌駕法秩序的專制政治。潛藏於此的弦外之音，則是他對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擴張王權，將使得法國從享有古憲法的法治文化與政治自由的王權政治淪為專制政治的疑慮。⁷⁶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最後一部份的法制史書寫，為他對十八世紀法國究竟是享有古憲法的王權政治抑或是專制政治的政治論述提供了基礎。與此同時，古憲法王權政治與專制政治的對比，也成為柏克與黑斯廷在大審期間論辯交鋒的論述脈絡。尤其要強調的是，

⁷⁵ “The Frankish monarchy was already founded; the regulation of its establishment was complet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661-668.

⁷⁶ 孟德斯鳩對路易十四絕對王權的顧慮是史家公認之事，相關研究與通論甚多，在此且不援引。僅就史料而言，孟德斯鳩個人對路易十四的評價，可參見孟德斯鳩的筆記：Montesquieu, *My Thoughts*, trans. Henry C. Clark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2), 385-389, 397.

柏克除了仰賴英格蘭固有的古憲法政治語言之外，更以孟德斯鳩式強調多元法秩序的古憲法論述，來表現十八世紀印度在東印度公司介入時，多省自治並維持地域法秩序的現象。⁷⁷柏克的觀點在於，伊斯蘭帝國的統治隨著帝國崩解，使得印度半島的政治局勢淪為各省軍事強人獨佔的景況。在這樣的情境下，唯一支撐法治秩序的是深化於印度社會的風俗與規範，而這種風俗與規範結合了各省的統治情境，成就了多元但脆弱的法治秩序。在此脈絡下，英國的介入應當是要協助強化既有的多元秩序，而非助長專制政治的遺毒，然而黑斯廷的作為卻悖離此原則。⁷⁸由此可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對王權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爬梳，尤其他以法制史書寫對前者古憲法論述的分析，構成了黑斯廷大審中政治辯論的論述脈絡。如本節伊始所強調的，這也正是《史論》所共享的脈絡。如著名的蘇格蘭啟蒙史家尼可拉斯·菲力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所言，羅伯遜從不諱言孟德斯鳩的著作對他歷史觀的影響；羅伯遜甚至可以被譽為最具孟德斯鳩風格的蘇格蘭啟

⁷⁷ 法秩序的多元性是英格蘭與法國古憲法語言的一大差異，目前學界對此兩種相似卻又有細膩差別的論述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有限，但針對法國古憲法論述或可參照：Robin Briggs, "From the German Forests to Civil Society: The Frankish Myth and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in France," in *Civil Histo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Keith Thomas*, eds. Peter Burke, Brian Harrison, and Paul Sl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2-250.

⁷⁸ 這個觀點可見於柏克與好友威廉·柏克(William Burke, 1730-1798)於1779年和寫的《論英國助長伊斯蘭征服的政策》(*Policy of Making Conquests for the Mahometans*)，參見Edmund Burke and William Burke, *Policy of Making Conquests for the Mahometans*,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 *India: Madras and Bengal 1774-1785*, ed. P. J. Mars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41-124;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528-538.

蒙史家。⁷⁹在充分爬梳藉由史學書寫所展現的古憲法與專制政治的政治論爭後，本文將把視角轉回《史論》的書寫，藉此指出羅伯遜在《史論》的論述如何受這樣的論述脈絡滋養，同時分析《史論》如何得以被視為一部仰賴如此歐洲啟蒙理念的論述資源，以為印度處境辯護的著作。

三、《史論》內的啟蒙運動

在爬梳《史論》與啟蒙史學書寫共享的論述脈絡之後，本節將具體說明，羅伯遜在《史論》的內容裡，如何具體地挪用了啟蒙史學書寫的要素。要言之，本節將分析羅伯遜如何藉由陳述古印度商業文明的發展，來闡述古印度社會必然也有相對應的古老制度，進而作為他申論印度作為古憲法政治而非專制政治的史學依據。

（一）古印度與商業社會

《史論》的寫作由正文四個章節與一個長篇附錄所組成，前者寫印度文明發展中的社會經濟史，後者則是羅伯遜對印度史作為人類文明發展一環所做的史學反思。更進一步說，羅伯遜在正文著重印度半島的居民如何與其他民族貿易交流的歷史。他將印度對外貿易的活動視為印度歷史發展的核心，並歸納出印度與其他文明的文化交流史，可以被視為各外來民族試圖尋找與印度文明的最佳貿易路徑的巡航史。羅伯遜同時指出，印度之所以得有如此的商貿境況，則又是因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在最原始的狀態裡，造物主將人類安置在那

⁷⁹ Nicolas Phillipson, "Providence and Progres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William Robertson," in *Robertson and Empire*, ed. Brown, 55-73.

溫潤富饒的東方。」⁸⁰羅伯遜認為，這樣的安排使得在東方生長的人類得以在相對富足的物質環境下開展工藝與科技，而印度無疑是最早有如此發展的地方。

這是《史論》開書前兩段的內容，這兩段的內容也已經表現出羅伯遜在《史論》的意圖，是藉由訴諸讀者十八世紀文人寫作的共通主題，以拉近英國讀者對印度文明的距離感。在這兩段敘事裡，羅伯遜首先藉由神學通論式的描繪，指出上帝讓人類於東方安居的安排，以此巧妙地迴避了孟德斯鳩式的東方專制論述裡，對於東方環境濕熱使人習於怠惰的鋪陳。在此之後，羅伯遜點出了沃壤將提供更充足的物質環境，以及這樣的物質環境將進一步促生工藝技術的發展以及商業活動的興盛。這段看似平凡的描述，其實包含了十八世紀讀者耳熟能詳的，啟蒙史學書寫中關於市民社會的三大主題：社會發展的階段論、商業與文雅社會、以及工藝與科學的發展。⁸¹依據啟蒙史學（尤其是蘇格蘭啟蒙的史學的論述，土壤的肥沃構成了人類定居並發展農耕社會的環境條件，而農耕所需求的密集勞力與技術，則會進一步推動社會的勞力分工與農業工藝成長。在啟蒙史學的書寫情境裡，這是人類社會開始邁向文明的表現，因為工藝的成就與勞力分工的現象，將反過來促進農事的產能，使得勞力不再需要聚集於農務，進而推使其他產業發展。如此演變的結果，將會使農業社會開始逐步轉型成為商業社會，

⁸⁰ “The original station allotted to man by his Creator, was in the mild and fertile regions of the East.”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

⁸¹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ocock, “Historiography and Enlighten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5:1 (2008): 83-96; Sophie Bourgault and Robert Sparling, “Introduction,” in *A Companion to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eds. Bourgault and Sparling (Leiden: Brill, 2013), 1-22.

而商業社會正是十八世紀歐洲得以自視為文明的象徵。⁸²

羅伯遜如此著重印度古代的商业社會，所要強調的正是印度在遠古時期，便已經存在著近似現代歐洲經驗的歷史現象。這種修辭除了指出印度古文明的成就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著墨商業貿易來擺脫讀者對印度屬於東方專制的印象。誠如著名的英格蘭史家基斯·湯瑪斯(Keith Thomas)在其晚近的著作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紀英格蘭的書寫文化裡，文明的程度與商業的發展息息相關，而商業的興盛同時也意味著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經商自由，以及規範商業的法治文化，使得「商業、文雅、藝文、文明、秩序」成了相互緊密關聯的詞組。⁸³羅伯遜對古印度商業貿易與藝文的強調，正是訴諸了當時讀者的共通習慣，以轉換孟德斯鳩式的東方專制論中的印度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羅伯遜對古代印度商業社會的描寫，是訴諸某種神意史觀(providential history)，強調印度古代的商业社會發展是源自造物主的安排。這又進一步凸顯羅伯遜與十八世紀歐洲多數對宗教抱持懷疑論精神的史家不同之處。啟蒙史學書寫的另一特色，是奠基於十六世紀以降人文學聖經批評傳統所開展而來的疑古態度。其根本是對於聖經與其他古文明(尤其諸如中國與印度)，對其文明根源可溯及亙古的批判，指出在缺乏出土與文獻證據的情況下，這類論述多只是迷思。⁸⁴羅伯遜固然承認他在《史

⁸² 商業社會與文明的關係，和商業造成的都市文雅文化興起有關。陳建元在〈交談、商業與文雅——丹尼爾·笛福與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的文雅文化〉一文中對此主題有精彩的討論。參見：陳建元，〈交談、商業與文雅——丹尼爾·笛福與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的文雅文化〉，《新史學》，31：3(臺北，2020)，1-70。

⁸³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 3 & 5.

⁸⁴ 這是啟蒙史學史與近代早期歐洲學術史探討甚深的主题，在此僅舉幾個重要的學術專著：Anthony Grafton, *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論》前兩段落對印度史存在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商業社會的暗示，是出於片段且轉手流傳的資訊，不足以作為扎實的歷史證據，但他旋即指出，根據傳世史料足以明確證明印度半島早已存在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⁸⁵

《史論》正文著重討論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伊斯蘭帝國以及十六世紀以後的歐洲與印度商貿往來的歷史。羅伯遜指出，這段商貿史同時也是五個帝國與文明，在不同歷史時期競奪壟斷與印度半島的貿易路徑的歷史。例如大流士一世(Darius I, 550-486 BCE)便藉由成功佔領印度河上游，而從印度的商業社會中獲取可觀的利潤。羅伯遜指出，大流士在此處所徵得的稅收即佔了波斯帝國整體稅收的三分之一。⁸⁶在他的評價裡，大流士將波斯帝國的領地擴張到印度河流域，展現了君王的洞見。與大流士相仿，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E)同時也展現出身為偉大君王的特質。羅伯遜認為這除了體現在亞歷山大作為立法者的品德與創建普世帝國的宏圖壯志之外，更體現於他意識到海權與商業將為帝國帶來興盛，尤其是與印度的貿易。除卻亞歷山大試圖征服印度的舉措之外，亞歷山卓港的建立也是為了得以掌握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印度半島的貿易樞紐。亞歷山大獨到的眼光，使得亞歷山卓港一直維持著它作為商貿中樞的地位，一直到了十八世紀，它仍舊是歐洲與非洲和印度商貿的核心要地。⁸⁷與此同時，亞歷山大對統治印度的渴望，也一併呈現在他派遣文人學者對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heehan, *The Enlightenment Bible*; Dan Edelstein,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0); Levitin, *Ancient Wisdom*.

⁸⁵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0.

⁸⁶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2.

⁸⁷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3-14.

印度文明的探究上，而這些探索隊遺留下的紀錄，則成為後世歐洲史家得以認識古代印度歷史的重要資源。⁸⁸《史論》進而著重亞歷山大對印度的態度，如何影響了後繼如羅馬共和與帝國時期。當羅馬人成功掌握地中海貿易後，同樣地也開始探索與印度進行貿易的可能，儘管羅馬帝國因為地緣因素，並未能如大流士和亞歷山大一般入境印度採取直接統治，但羅馬人所採取的方針基本上延續了亞歷山大時期的策略：拓展並壟斷新的商貿路徑，以及考察印度當地的社會文化。《史論》尤其著重的，是羅馬帝國統治下的航海與商貿精神，如何使得他們成功掌握希波魯士(Hippalus, c. 1st century BCE)探勘的路徑：自地中海經陸路穿越波斯灣，進而借助印度洋的季風航至印度半島。《史論》提及，羅馬史學家如史特拉波(Strabo, 63 BCE - 23 BCE)、老普林尼(23-79)等人對此路徑的詳細記述，足以體現這條商路的重要性。⁸⁹羅伯遜藉由這些不同帝國史家的筆下，對印度文明交流的文字作為間接證據，指出歐亞古代文明從波斯帝國到羅馬帝國皆極力重視與印度半島的商貿，以此補足他在《史論》前兩段裡，自認證據稍嫌不足的對古印度商業社會的論述。在此之後，《史論》進而指出，印度的商業社會之所以能吸引歐亞帝國的商貿興趣，原因在於印度的奢侈品生產。換言之，歐亞帝國與印度的商業貿易皆是奢侈品貿易，而非生活必需品的往來。⁹⁰在此，羅伯遜又一次訴諸十八世紀英國商業社會與文雅文化的語言，藉由指出古印度的奢侈品文化，在強調印度商業社會發達的同時，也暗示了印度文雅文化的存在。⁹¹

⁸⁸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8-24.

⁸⁹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47-78.

⁹⁰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52.

⁹¹ 關於十八世紀奢侈消費的研究如過江之鯽，在此僅列舉部分與本文相關之經典成果：Christopher Berry,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適度的奢侈品貿易有助於刺激商業，進而得以促使國家興盛。這是《史論》書寫的十八世紀中後期，羅伯遜的讀者已經相對熟悉的論述主題。與羅伯遜同時期的蘇格蘭啟蒙哲人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即分析道，一個社會裡存在適當的奢侈品流通，意味著這個社會的勞力分工允許部分人得以從事更為精緻的工藝生產，而這將使得人力不會被全然束縛於農地耕作上。在休謨眼裡，這表示工藝的發展本身即是促使社會得以享有自由的現象。原因在於，如果社會不存在允許工藝發展的勞力分工，社會中人將會自然而然地被分成持有土地的地主以及付出勞力耕種的農民這兩種階級。後者的生計將無可避免地依賴前者，前者則將逐步成為享有影響他人計的暴君。休謨強調，這樣的情境將會比最為專制的政府還要惡劣。與此相反的是，在奢侈品流通的商業社會裡，從事不同勞力的人皆得以透過商品交換滿足自身物質需求，進而得享獨立自主的生活，而這又會成為公共自由的基礎。⁹²欠缺商業發展的農業文明容易流於專制政治，也是孟德斯鳩式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xine Berg, "In Pursuit of Luxury: Global History and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182 (2004): 85-142; 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 in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eds. Berg and Eg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7-27; István Hont, "The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Commerce and Lux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s. Mark Goldie and Robert Wok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79-418; Richard Whatmore, "Luxury, Commerce,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James A.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76-592.

⁹² David Hume, "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 in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Eugene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revised edition), 268-280.

的東方專制論的特質之一。《史論》在強調古印度的商業社會與商貿之後，進一步著重印度奢侈品的產出。羅伯遜又一次訴諸商業社會的語言，來加深讀者對古印度文明的印象，並試圖改變時人對印度基於孟德斯鳩式東方專制論的形象。這可見於羅伯遜對印度奢侈品的分析。印度輸出的展品以香料、寶石飾品與絲織品為大宗，而香料的生產、雕琢寶石的手工藝、和絲質紡織都需要專業的技術與勞力。換句話說，這三項產業的發達除了進一步強化他對古印度商業社會的論調外，也證明了古印度存在著十八世紀歐洲商業社會所具備的勞力分工、精緻工業以及對應這種工業所需的技術。⁹³《史論》再次說明，現代歐洲對印度奢侈品的需求並未少於古代，而現代印度依舊足以有充足的生產以滿足這些需求，足以表示現代印度的工藝並未有停滯或倒退。⁹⁴

羅伯遜對古印度商業社會的描述，鋪陳了印度並不如東方專制論述裡，存在著使專制政治扎根成長的環境。事實上，印度的社會文化自古以來，便與孟德斯鳩對亞洲專制政治開展的論述相反；它所享有的是存在勞力分工、精細產業與奢侈品貿易的商業社會。《史論》在描繪古代帝國與印度的貿易之後，轉而陳述歐洲與印度貿易中斷與復甦。前者是肇因於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經濟嚴重衰退無法負擔也失去對奢侈品貿易的興趣，後者則是隨著十字軍東征以及義大利商業城邦(尤其是威尼斯)的興盛，才重新使得印度的貿易成為歐洲的統治者關切的重點。⁹⁵在歐洲陷入經濟衰退的同時，印度的商業社會也面臨嚴苛的處境。隨著伊斯蘭帝國的興起與擴張，伊斯蘭帝國的統治者同樣也有著統治與壟斷印度手工業與奢侈品貿易的野心；伊斯蘭帝國

⁹³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56-61.

⁹⁴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64-65.

⁹⁵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06-113.

佔領埃及與波斯灣阻斷了羅馬帝國以降的商貿航路，間接推使了歐洲文明發現好望角航道。⁹⁶

到此為止，《史論》正文藉由不同文明與印度經貿的歷史，點出古印度商業社會的環境，並指出伊斯蘭帝國治理下的印度所面臨的是商業社會面臨專制政治的困境，而這同時也是十八世紀英國與歐洲讀者所能感同身受的處境。英國所面臨的專制政治是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而歐洲自十六世紀以降所面對的，則與印度商業社會同樣是來自伊斯蘭帝國威脅的陰影。羅伯遜在此試圖以印度與十八世紀歐洲的平行對比來強化讀者的感受，而這也可見他在《史論》正文的結語。在《史論》第四章的最後一段裡，羅伯遜寫道他非常慶幸塞利姆一世(Selim I, 1470-1520)與蘇萊曼一世(1494-1566)壟斷印度的野心未能實踐，否則一旦伊斯蘭帝國得以掌握印度的商業社會，它將受印度商業利益資助，並獲得遠超過同時期歐洲所能抗衡的軍事力量。在羅伯遜看來，印度商業社會得以保全，不受伊斯蘭專制政治腐化，對歐洲的歷史發展與人類文明皆有著深遠的影響。正因為伊斯蘭帝國在十六世紀未能自印度的商業社會獲利，使得歐洲仍能勉力阻擋鄂圖曼土耳其的擴張：

幸運的是，對人類而言，伊斯蘭帝國那建立在反自由的宗教狂熱之上的專制體系政府，在摧毀了古代三大科學重鎮：埃及、亞述與希臘後，無法將統治延伸到歐洲，進而壓迫歐洲的自由、學術與品味，這些特質在歐洲重新萌芽之時，不至於被伊斯蘭帝國阻礙，而得以使歐洲重新庇護、啟蒙，並使歐洲重新庇護、啟蒙、並美化人類文明。

Happily for the human race, the despotic system of Turkish government, founded on such illiberal fanaticism as has extinguished

⁹⁶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49-157.

science in Egypt, in Assyria, and in Greece, its three favourite mansions in ancient times, was prevented from extending its dominion over Europe, and from suppressing liberty, learning, and taste, when beginning to make successful efforts to revive there, and again to bless, to enlighten, and to polish mankind.⁹⁷

(二) 古印度與古憲法政治

在正文之後，《史論》的長篇附錄，繼而著重古印度的商業社會構成了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使得印度得以在伊斯蘭帝國的統治下，依然足以抵擋專制政治。為什麼當伊斯蘭帝國夾帶其專制政治席捲各大古文明時，古印度得以倖免，甚至使得伊斯蘭帝國在印度的統治，反而逐漸受到印度當地的政治形態影響而轉變？根據羅伯遜的分析，造成如此影響的原因不為其他，正是因為根深於印度社會的古憲法。羅伯遜對印度古憲法的概念，與柏克在黑斯廷大審開庭的辯詞相仿，皆指向存在於印度社會中的種姓制度。但羅伯遜更進一步指出，種姓制度不僅根植於社會的政治制度與法治文化；種姓制度同時也是支撐印度勞力分工與商業社會的社會規範。羅伯遜首先指出，古印度的高度文明發展，可以見諸於其政府形式與憲政體制。⁹⁸他繼而強調，儘管古印度的政府型態確實是君主政治，但「君王絕非擁有不受限的專制權力」，而這是因為體現在印度社會中種姓制度的古憲法確保了印度與其他亞洲帝國不同，存在著限制王權的建置，而這使得古印度有著

⁹⁷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192-193.

⁹⁸ "Another proof of the early and high civilization of the people of India, may be deduced from considering their political constitution and form of government."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03.

更近似於歐洲的政治環境：

印度社會存在著確立並保障人民權利的制度，而這是任何其他亞洲偉大王國不曾衍生出來的憲政，儘管歐洲的人民對這樣的制度十分熟稔。

Institutions destined to assert and guard the rights belonging to men in social state, how familiar soever the idea may be to the people of Europe, never formed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n any great Asiatic kingdom.⁹⁹

羅伯遜認為，種姓制度確保了印度人民在社會裡有著不同的職責。統治者均來自於職司政府行政與軍事外交的刹帝利階級，但就社會階級而言，在刹帝利之上還有婆羅門的存在，使得古印度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並不像其他亞洲政體僅存在著上對下的權力關係。換言之，種姓制度確保了統治者只是具備特定的階級職權，但就整個政治體的運作來說，社會裡還存在著更上層的階級。在羅伯遜看來，從刹帝利的統治職責包含了必須諮詢婆羅門一事即可見到，種姓制度使得印度得以從社會規範上避免了統治者濫權的可能。¹⁰⁰

《史論》繼續申論道，種姓制度這類不成文甚至沒有明確強制效力的社會規範，在印度還能被不同階級的人共同遵守，其核心因素就在於，這種社會規範已經深刻內化成印度人視之為理所當然的風俗習慣。羅伯遜在此對種姓制度的敘述，全然挪用了本文第二節所分析的，歐洲古憲法論述的語言結構。例如羅伯遜指稱，「印度風俗習慣的遞

⁹⁹ “Though monarchical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all the countries of India to which the knowledge of the ancients extended, the sovereigns were far from possessing uncontrolled or despotic power...”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05.

¹⁰⁰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06.

嬪，在歷史更迭中幾乎未有改變，這使得我所論述的這些古印度的制度至今仍舊存在於社會裡。」¹⁰¹而在論及古印度法治文化時，羅伯遜更直接指出了古印度文明存在著普通法(common law)與不成文法的傳統，而這甚至是人類文明普世共享的特色：

是以，早在成文法令明確定義何謂財產權，或任何成文法規定獲取財產與轉移財產的方式之前，社會會逐漸發展出一套習慣規範或普通法作為仲裁爭議的標準，而所有依此標準的裁決結果也都會受到社會所敬重，因為這套規範法則是經年累月的智慧與經驗積累的結果；這在每個國家皆當如是。

而早在歐洲人第一次造訪印度時，這樣的司法體系看來早已存在於印度。儘管根據印度人自身的文獻，他們並不存在著成文法系統，但任何爭端皆可以依據先前的判例所裁示……

Thus, long before the nature of property is defined by positive statutes, or any rules prescribed concerning the mode of acquiring or conveying it, there is gradually formed, in every state, a body of customary or common law, by which judicial proceedings are directed, and every decision conformable to it is submitted to with reverence, as the result of the accumulated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ages.

In this st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eems to have been in India when first visited by Europeans. Though the Indians, according to their account, had no written laws, but determined every controverted point by recollecting what had been formerly decided...¹⁰²

¹⁰¹ “As manners and customs in India descend almost without variation from age to age, many of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s which I have enumerated still subsist there.”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12.

¹⁰²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13.

在引文的第一個段落裡，羅伯遜援用了蘇格蘭啟蒙運動常見的，分析人類文明發展的四階段論式哲學史論(philosophical history)，強調了法治文化之於文明開展的普遍性。¹⁰³這有著一定的修辭效果，暗示了印度作為有著高度商業發展的古代文明，必然經歷過法治文化成形的階段。在下一個段落隨即點開暗示，指出印度確然存在著如斯古老的普通法系統。但更重要的是，羅伯遜強調了印度法體系的兩個特質，試圖將印度的法治文化呈現為與英格蘭古憲法相去不遠的體系。這分別是法的不成文性，與判決仰賴判例的特質。

《史論》的讀者對此不會感到陌生。本文前一節提及的布萊克史東在其暢銷的《英格蘭法評述》裡，便指出不成文法與仰賴判例是英格蘭古憲法與羅馬法體系最大的差異。¹⁰⁴在論及不成文法時，布萊克史東寫道：「當我以未被書寫紀錄的法(*leges non scriptae*)來稱呼我國這類的法律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些法律在今天僅只靠著口耳相傳而存續。」誠然，在不成文法為核心的古憲法社會裡，在法律規範初現之時，法治文化可能僅靠著風俗習慣與集體記憶而存續。但隨著判例積累，這些根深於社會風俗的法文化將會成為判例而儲置於政府司法機關的檔案紀錄裡。這使得不成文法在符合當地風俗的基礎上，依舊具有文字紀錄作為依循，供必要之時得以彙整成冊。¹⁰⁵這表示印度的法

¹⁰³ 在十八世紀中葉，這種哲學史論的論辯有一個核心課題是，究竟在法治文化出現於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裡，是先有法的成熟還是先有立法者的存在？羅伯遜在此的論述更傾向古憲法的語言，指出法的發展是社會文化的一環，而非英明的立法者出現從無到有創生法體系的思維。關於法與立法者的辯論，參見：István Hont,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eds. Béla Kapossy and Michael Sonensc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3.

¹⁰⁴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58-61.

¹⁰⁵ “When I call these parts of our law *leges non scriptae*, I would not be understood

律儘管不若羅馬法一般鉅細靡遺，卻與布萊克史東論下的英格蘭法一樣，有著更貼近社會文化變遷的面向。¹⁰⁶《史論》提及了兩次法典彙整的事件。第一次是阿克巴一世(Akbar I, 1542-1605)治理時期。羅伯遜指出，阿克巴一世身為蒙兀兒帝國唯一不受伊斯蘭專制政治影響的皇帝，在認知到印度存在著根植社會風俗的法治規範之後，便意識到必須根據當地法治文化來治理印度。因此，在其重要資政大臣(維齊爾, vizier)阿布一法瑟·孟巴拉克(Abu'l-Fazl ibn Mubarak, 1551-1602)的協助下，阿克巴一世諮詢了印度當地熟習司法資料之人，整理並記述了印度法典。第二次的事件，則正是發生於東印度公司深入印度之時。羅伯遜認為，黑斯廷參考了阿克巴一世的精神，與東方學學者諮詢當地婆羅門編纂了《印度法典》。¹⁰⁷有趣的是，羅伯遜並未直接提及黑斯廷與柏克的辯論，也未曾對大審有任何評論，僅只是點出黑斯廷如何遵循印度古憲法的精神治理。這看似是在間接地為黑斯廷辯護，然而參照前一節的討論則可見到，羅伯遜與黑斯廷對印度是否是專制政治的見解相異；他的立場更接近援引古憲法論述的柏克。在欠缺直接與間接證據的情形下，本文無法論證《史論》的這點評論，是否反映了羅伯遜對大審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唯一得以確認的是，《史論》對印度的分析，確實與黑斯廷大審共享了同樣的爭論；即印度的政治傳統究竟是古憲法的法治文化，還是孟德斯鳩式的東方專制。對此，《史論》無疑地採納了印度存在著古憲法的法治文化的立場。

as if all those laws were at present merely *oral*, or communicated from the former ages to the present solely by word of mouth”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48-49.

¹⁰⁶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16-219;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Vol. I, 51-55.

¹⁰⁷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14-216.

《史論》與柏克不約而同地將種姓制度視為維繫印度法治文化與政治秩序的古憲法傳統。比起柏克在議會演說的辯詞，《史論》有著更充足的篇幅分析印度古憲法除了內化成為社會風俗與法的不成文以外的特徵。其中羅伯遜最為強調的，是印度的古憲法與孟德斯鳩對法國古憲法的分析相仿，皆存在著制衡王權的社會階級。前述已經提及，由於種姓制度的設置，使得印度法政體系下的君王與臣民的關係，不會是簡單的上對下的絕對關係。在社會裡存在著比君王更為顯赫的階級，使得君王的施政與言行均須有所節制。除此之外，《史論》也指出，根據種姓制度的劃分，多數平民所位居的吠舍階級才是職司經濟活動的階級。這使得印度社會裡，身為貴族與統治階級的婆羅門與刹帝利對平民皆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更有甚者，這表示種姓制度作為印度古憲法傳統，實則規範了印度的社會分工，成為印度得以發展成為商業社會的基礎。¹⁰⁸在羅伯遜看來，種姓制度這種將多數平民作為農耕主力的分工設計，體現了印度古憲法的立法者以農業作為經濟行為基礎的原則，這也表示這群古代立法者(ancient legislators)已然深諳可比擬十八世紀歐洲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知識，藉由確保生活物質無虞，促發其他產業與分工的出現。¹⁰⁹《史論》長篇附錄最後的篇幅，聚焦分析古印度的藝文與科學工業發展及其宗教文化，而將這三者串聯的，正是印度的手工業與奢侈品生產。印度的宗教文化使得社會存在著精緻產業的出現，精緻產業則又仰賴相對應的工業技術，這種連鎖反應，正是印度古憲法構成的社會階層分工基礎促使印度的奢侈品

¹⁰⁸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08-209.

¹⁰⁹ “These maxim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ancient legislators of India have a near resemblance to the system of those ingenious speculator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modern times...”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09-210.

生產，並吸引不同歐亞各大帝國競爭與印度貿易的遠因。¹¹⁰這一點又同時體現了另一處《史論》挪用孟德斯鳩式的分析之處：王權政治的商業模式通常以奢侈品貿易為核心，相對地，專制政治則往往不具備商業的存在。¹¹¹如此一來，《史論》得以回到孟德斯鳩式的語言，強調古印度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奢侈品貿易為利潤核心的商業社會，而這樣的商業社會所具有的，是具備古憲法法治文化的王權政治，並非貫徹農業均貧的專制政治。

四、結語

本文藉由分析《史論》及其論述脈絡，指出歐洲啟蒙運動的政治思想與政治辯論中，以史學書寫作為論述媒介的特質。本文強調了古憲法與專制政治這兩種不同模式的史學書寫（一則是法制史，一則是以環境分析為基礎的社會史），如何分別為十八世紀末英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黑斯廷大審中，辯論的兩造當事人（黑斯廷與柏克）提供議論的脈絡。本文進而指出，當時最重要的史家之一羅伯遜的封筆之作，也共享了相同的論述脈絡。羅伯遜大量援用了古憲法的語言，藉由對古印度史的爬梳，反駁印度被視為東方專制政治的印象。或許正因如此，比起羅伯遜其他暢銷史學著作，《史論》有著毀譽參半的評價。例如羅伯·華爾波（Robert Walpole, 1676-1745）的幼子、著名的藝術史與建築史家赫瑞斯·華爾波（Horace Walpole, 1717-1797）在評價《史論》時便指出，這是一本材料零散記述紊亂，且富含對歐洲偏見的著作：

……如果（誠如《史論》所言），東方的發展要早於歐洲，那麼至少歐洲的進步速度是千倍於印度。如果歐洲與印度的商貿往來不

¹¹⁰ William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229-231.

¹¹¹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340-341.

曾中斷，更有可能是印度將從與歐洲貿易而獲利，而非(如《史論》所宣稱的)是歐洲受益於印度。

... if the East improved much earlier than Europe, Europe at least advanced with a thousand times the rapidity, should a mutual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extremities of Europe and India continue, the latter is more likely to improve by Imports than the former will by what India transports to it.¹¹²

《史論》是一部藉由歷史書寫傳達明確政治意圖的作品。正如羅伯遜在《史論》附錄結尾的自白所言：「倘使我對印度早期高度文明、以及對當地居民的優雅藝文與實用科學所構成的進步社會的書寫，得以被讀者視為言之有理的論據，這本書或許將能對歐洲人對待印度人的言行舉止產生正面影響。」¹¹³這使得羅伯遜書寫《史論》的過程，切當地表現了史家波考克所提倡的，曾經屬於啟蒙史學的理念：史家藉由歷史書寫，作為參與政治現象的行動者；與此同時，歷史書寫也不再只是對於政治與社會事件的敘事。藉由史家有意識地以寫作歷史來表述其現實關懷，史學寫作本身也成為政治現象。¹¹⁴本文以《史論》作為切入點，在指出十八世紀歐洲如何將歷史書寫作為政治論述的同時，也強調當史家藉由歷史書寫實踐政治行動時，將難以避免地與其他歷史書寫所牽涉的政治論述交錯。這使得本文的研究，除了是對啟蒙時期歐洲史學史的爬梳之外，也得以對歷史思維的反思提出間接的貢獻。歷史寫作(historical writing)本身必然受到史家的歷史知識形塑，而史家的歷史知識又受益於史家對既有史學(historiography)的認知與反思。

¹¹² MS. 3944, folio. 60,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¹¹³ Robertso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335.

¹¹⁴ Pocock,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257-270.

當史學本身開始成為政治現象、歷史書寫開始成為政治論述，即表示史家在寫作歷史時，也很可能會有意識地牽涉並挪用存在於既有歷史書寫當中的政治意涵。

事實上，晚近的歷史哲學與史學史的反省，就此議題提出不少反饋。史家在書寫歷史時，可能會採用特定的語言結構與修辭模式表現出史家的現實關懷，使得史學不會僅只是客觀陳述與記敘歷史事件的文類。¹¹⁵而史家之所以選擇以如此迂迴的方式表現自我，則又可能進一步體現在史家對歷史作為思辨人類活動現象的模式之認同。¹¹⁶分辨不同的歷史書寫可能共享的語言結構，或進而深究歷史書寫所呈現的論述脈絡，本身便成為探究某個時空背景下文人作者對人類活動現象思辨的工作。換句話說，史學史的分析與探討，深具某種批判性的內涵，其批判的對象未必是特定人物的言行，而是人們對特定事件與環境的認知。¹¹⁷這種史學史式的思辨，對當代史家而言應是不會受到太多非難的常識。關於歷史作為思維模式，以及將歷史書寫視為乘載哲思的認知工具的洞見，也仍見於當代歷史哲學與歷史理論的論辯之中。但同樣地，這類的思辨與反思也容易流於疏遠史家實際歷史書寫的過程與經驗的哲學辯論。¹¹⁸過度著重史學書寫的哲學意涵，極有可能表

¹¹⁵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¹¹⁶ Michael Bentley, "General Introduction: The Project of Historiography" and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Modernit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ed. Bentley (London: Routledge, 1997), xi-xvi, 379-496.

¹¹⁷ Karl Löwith,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¹¹⁸ 舉例來說，近期《歷史哲學》(*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期刊的主編發刊語即直言，關於史學史與歷史書寫的哲學反思，當受益並被視為廣義哲學(而非史學)辯論的一環。Jouni-Matti Kuukkanen, "Editorial: It's Time for Fresh Idea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022): 1-5.

現出史學分析者的哲學偏好，卻無法有效反映歷史書寫過程與內容所蘊含的，構成歷史書寫之所以可能的歷史知識及其侷限。¹¹⁹

言及此，可見「歷史」存在著至少三種樣貌：歷史書寫、將歷史作為思維模式，進而對史學史進行反思、以及歷史哲學。在反思「歷史有什麼用」的時刻，常見到一類批評，即史家如果單純只從事歷史書寫，而不帶後兩者的批判反思，則歷史書寫本身不過流於某種「好古癖」(antiquarian)的興趣，失去了人文學的知識精神。¹²⁰然而，這三者本來就是存在緊密關聯卻又性質不同的問題意識。史家可以不帶後兩者的意識，純粹將歷史書寫視為歷史學工作者的專業職責進行寫作，而這無損於歷史書寫本身所蘊含的價值。一部史料運用嫺熟、寫作流暢、論證扎實的歷史研究，不該因為史家不強調史學的哲學反思而影響其評價。¹²¹同樣地，歷史哲學家也很可能全然不從事歷史書寫，而單從後兩者出發，藉由哲學思辨指出特定歷史論述可能蘊含的哲學疑慮。¹²²本文所描繪的，卻正好是史家有意識地將歷史作為思維模式，

¹¹⁹ Brian Young, "The Tyranny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Some Thoughts on the Ar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8:1-2 (2002): 101-117.

¹²⁰ 事實上，史學史家亞諾·莫米里亞諾在其啟蒙史學史的經典研究裡指出，啟蒙史家正是基於這種純然好古的強烈智識興趣，才會將他們對時代的反思寄託於史學寫作裡。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3:3/4 (1950): 285-315.

¹²¹ 例如，英國史家基斯·湯瑪斯在訪談提及個人的史學研究時，即曾指出史家與社會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不同，史家在從事歷史工作時，不會以個人的哲學觀念作為引導。但這並無損於湯瑪斯的歷史研究。Peer Vries, "'Historians Don't Have Any Ideas of Their Own': In Gesprek met Keith Thomas," *Leidschrift* 2 (1990): 99-113.

¹²² 政治科學家與哲學家 Mark Bevir 對史家 Quentin Skinner 與所謂劍橋學派方法論的批判，即是一例。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並藉由歷史書寫對史學史進行反思。《史論》的寫作，藉由有意識地挪用古憲法的法制史傳統，試圖反駁孟德斯鳩式的東方專制論思維。當然，以現代的史學眼光看來，《史論》的論述內容受限於材料與十八世紀的思維，使得《史論》對印度史的敘述存在著不少美化或誤解的內容。但就《史論》作為一部屬於十八世紀的歷史著作而言，它無疑表現了啟蒙時期歐洲將史學作為政治論述的形式，以及歷史作為政治思辨的豐富內涵，也表現了啟蒙時期的歐洲，不僅是屬於哲人與理性的時代，它更是以歷史書寫實踐哲學思辨與政治辯論的時代。

(本文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收稿；2023 年 5 月 8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啟蒙憲政理論與國家目的：省思『政治性的概念』」（計畫編號 108-2410-H-001-100-MY3）成果。感謝國科會經費允許執行研究。本文研究期間，得益於諸多師友討論，特別感謝陳正國教授、陳建元教授、傅揚教授、Richard Bourke 教授、Brian Young 教授、與 Peter Marshall 教授於本文寫作期間，不厭其煩地與作者討論，並提出諸多寶貴意見。中研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環境，感謝中心同仁蕭高彥教授、曾國祥教授、陳宜中教授、陳嘉銘教授對啟蒙與帝國的研究社群所提供的資源。本文受益於匿名審查人與《新史學》編委會對本文最終版本提出修改建議。

徵引書目

一、檔案材料

MS. 3944 Robertson-MacDonald Papers,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二、歷史文獻

Blackstone, William.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4 Vols, edited by Wilfrid Pr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Burke, Edmund.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 *India: Madras and Bengal 1774-1785*, edited by P. J. Mars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I, edited by P. J. Mars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VII, edited by P. J. Mars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Coke, Edward. *Part Seven of the Reports: Calvin's Case*, in Edward Coke, *The Reports of Sir Edward Coke in Thirteen Parts*, Vol. IV, edited by John Henry Thomas and John Farquhar Fraser. London, 1826.

Dow, Alexander. *The History of Hindostan,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Death of Akbar,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of Mahummud Casim Ferhista of Delhi, together with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Brahmins*. London, 1768.

Dugal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William Robertson*. London, 1801.

Du Bos, Jean-Baptiste. *Histoire Critique de L'E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dans les Gaules*, Tom. II. Amsterdam, 1735.

Hale, Matthew.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2nd edn. London, 1716.

Halhed, Nathaniel. *A Code of Gentoo Laws, or Ordinations of the Pundits, from a Persian Translation made from the Original written in the Shanscrit Language*. London, 1776.

- Hastings, Warren. *The Defense of Warren Hastings, Esq. (late Governor General of Bengal), at the Ba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upon the Matter of the Several Charges of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Presented Against Him in the Year 1786*. London: 1786.
- Hume, David.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Mill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revised edition.
-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edited by Anne M. Cohl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My Thoughts*. Translated by Henry C. Clark.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2.
- Orme, Robert. *Historical Fragments of the Mogul Empire, of the Morattoes, and of the English Concerns in Indostan: from the Year 1659*. London: 1805.
- Robertson, William. *An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Concerning the Knowledge which the Ancients had of India: and the Progress of Trade with that Country prior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Passage to it by the Cape of Good Hope*. London, 1791.
-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Oxford Shakespeare: Richard II*, edited by Anthony Dawson and Paul Yachn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II, edited by R. R.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三、近人論著

- 陳正國，〈從專制到東方專制——十八世紀英國殖民進程與東方專制論的源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4(臺北，2017)：917-995。
- 陳建元，〈交談、商業與文雅——丹尼爾·笛福與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的文雅文化〉，《新史學》，31：3(臺北，2020)，1-70。
- 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臺北：聯經，2013。
- Bayly, C. A.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tie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entley, Michael,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7.
- Benton, Lauren, and Richard Ross, eds. *Legal Pluralism and Empire, 1500-180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 Berg, Maxine. "In Pursuit of Luxury: Global History and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182 (2004): 85-142.
- Berg, Maxine, and Elizabeth E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 In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Berg and Eger, 7-27.
- Berg, Maxine, and Elizabeth Eger, eds.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 Berry, Christopher.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evir, Mark.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loxham, Donald. *Why History?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 *History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Bourgault, Sophie, and Robert Sparling, eds. *A Companion to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Leiden: Brill, 2013.
- Bourke, Richard. *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Briggs, Robin. "From the German Forests to Civil Society: The Frankish Myth and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in France." In *Civil Histories*, edited by Burke et al, 232-250.
- Broadie, Alexander, and Craig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rown, Stewart. *William Robertson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William Robertson, Early Orient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on India of 1791."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88 (2009): 289-312.
- Burke, Peter, et al, eds. *Civil Histo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Keith Thom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allanan, Keegan. *Montesquieu's 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Carcassone, Élie.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7.
- Camall, Geoffrey. "Robertson and Contemporary Images of India." In *William Robertson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edited by Brown, 210-230.

- Camall, Geoffrey, and Colin Nicholson, eds. *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Papers from a Bicentenary Commemor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 Champion, Justin. *The Pillars of Priestcraft Shake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Its Enemies 1660-17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ourtois, Jean-Patrice. "Le Physique et le Moral dans la Théorie des Climats de Montesquieu." In *Le Travail de Lumières*, edited by Grapa et al, 139-56.
- Cox, Iris. *Montesquieu and the History of French Law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83.
- Craiutu, Aurelian. *A Virtue for Courageous Minds: Moderation in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1748-18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de Casabianca, Denis. "Une Anthropologie des Differences dan L'Esprit de Lois."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75 (2012): 405-423.
- de Dijn, Annelien.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from Montesquieu to Tocqueville: Liberty in a Levelle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Edelstein, Dan.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0.
- Edney, Matthew.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llis, Harold. "Montesquieu's modern politics: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Monarchy in Old Regime Fra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0:4 (1989): 665-700.
- Goldie, Mar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2:1 (2019): 3-34.
- Goldie, Mark, and Robert Wokl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rafton, Anthony. *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rapa, C. et al, eds. *Le Travail de Lumiè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2.
- Harris, Jame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Hont, István. "The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Commerce and Lux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Goldie and Wokler, 379-418.
- .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edited by Béla Kapossy and Michael Sonensc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Kantorowicz, Ernst.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Kusukawa, Sachiko.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al Philosophy: The Case of Philip Melancth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uukkanen, Jouni-Matti. "Editorial: It's Time for Fresh Idea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022): 1-5.
- Lemmings, David. *Law and Government in England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Lieberman, David. *The Province of Legislation Determined: Legal Theor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evitin, Dmitri. *Ancient Wisdom in the Age of the New Science: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in England c. 164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Lines, D. A. *Aristotle's Ethic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a. 1300-1650):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 Education*. Leiden: Brill, 2002.
- Löwith, Karl.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 Marshall, P. J. *The Impeachment of Has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arshall, P. J., ed. *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Hindu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tysin, Anton, and Dan Edelstein, eds. *Let There Be Enlightenment: The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ources of Rational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 McDaniel, Iain.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Roman Past and Europe's Fu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Momigliano, Arnald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3:3/4 (1950): 285-315.
- Mortimer, Sarah, and John Robertson, eds. *Th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Heterodoxy*. Leiden: Brill, 2012.
- Moura, Fernanda.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Shakespeare's *Richard II* and Its Early Stage History." *Scripta Uriandrade* 17:3 (2019): 125-140.
- Muthu, Sankar.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O'Brien, Kar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Oz-Salzberger, Fania.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Broadie and Smith, 151-176.
- Pitts, Jennifer. "The Global in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Thought." In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edited by Prasenjit Duara et al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4), 184-196.
- .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Phillipson, Nicolas. *David Hume: The Philosopher as Histori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 "Providence and Progres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William Robertson." In *Robertson and Empire*, edited by Brown, 55-73.
- Pocock, J. G. A.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2nd edn. with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Historiography and Enlightenment: A View of Their Histor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5:1, 2008, 83-96.
- . "Historiography as a Form of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7:1 (2011), 1-6.
- . *Barbarism and Religion*, 6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2015.
- Rendall, Jane. "Scottish Orientalism: From Robertson to James Mil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5:1 (1982): 43-69.
- Robertson, John. "Sacred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apolitan Responses to the Problem of Sociability after Hobb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1 (2013), 1-29.
- Schmitt, C. B. *Aristotle and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ebastiani, Silvia. "Beyond Ancient Virtues: Civil Society and Passions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2:5 (2011), 821-820.
- Shackleton, Robert. *Montesquieu: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Sheehan, Jonathan. *The Enlightenment Bible: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mitten, Jeffrey. "Robertson's Letters and the Life of Writing." In *Robertson and Empire*, edited by Brown, 36-54.

- . *The Life of William Robertson: Minister, Historian, and Princip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 Thomas, Keith.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Vries, Peer. “‘Historians Don’t Have Any Ideas of Their Own’: In Gesprek met Keith Thomas.” *Leidschrift* 2 (1990): 99-113.
- Whatmore, Richard. “Luxury, Commerce,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Harris, 576-592.
- White, Hayd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omersley, David.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Robert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3 (1986): 497-506.
- Young, Brian. “The Tyranny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Some Thoughts on the Ar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8:1-2 (2002): 101-117.
- Cheney, Paul. “Lumière écossaises.” *Dictionnaire Montesquieu* (en ligne), dir. Catherine Volpillac-Augier (2013): <http://dictionnaire-montesquieu.ens-lyon.fr/fr/article/1376427088/fr/> (accessed 20 May 2022).

Historiography as Political Thought: Ancient Constitution, Oriental Despotism, and the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of Ancient India*

Alvin Che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is about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it examines William Robertson's least celebrated work,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of Ancient India* (1791). By exploring the discursive contexts of the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historiography was a distinct form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shared two discursive contexts with debates during the impeachment of Warren Hastings, the first governor-general of Bengal Presidency. These were the languages of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oriental despotism, and both were employed in attempts to characterize the nature of Indian political culture. The paper further demonstrates how both contexts were affected by Montesquieu's politico-historical writings. Having established the discursive contexts of the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the paper advances the argument that the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embodies the notion which the historian J. G. A. Pocock calls "historiography as political thought."

Keywords: William Robertson, Montesquieu, Ancient Constitution, Oriental Despotism,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